

多孔石、玉刀的研究

楊美莉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內容提要】在歷代出土或傳世的玉器中，被累加上最多文化記號的，就數新石器時代西北地區製作的多孔玉刀了，例如加鑽圓孔、加刻牙飾、加琢花紋、剖切成薄片、一端削窪等，對這些所謂的「文化記號」，不少是成器之後累加上的，然今人始終不甚理解其中個別的涵義，本文主要嘗試從考古資料中進行蒐集與梳理，並輔以各博物館館藏器，利用一些論證，期能解決其中的若干問題。

多孔石、玉刀的分布，今日看來還是極不均衡的，它不像作為生計工具的石刀，普遍存在於大多數的遺址中；江淮地區的南京北陰陽營文化遺址出有二件七孔石刀，安徽潛山薛家崗文化遺址出土三十餘件，孔數依奇數累進，有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孔者，製作精整；除此之外，大量的多孔玉刀出於黃河中、上游區。

此類多孔石、玉刀，基本上均非日常生計用器，是屬於玉兵性質的禮器；江淮地區的多孔石刀的製作，其依序的奇數孔的表現，反映此地區長久以來發展天文、曆算的傳統；黃河中、上游的多孔玉刀，與牙璋的製作相互啓發，相互分享共同的製作經驗，而器面上所留下的豐富的文化記號，不外是各個時期宗教、政治、藝術的表現。

一、前言

有關石刀的課題，在三十年代有水野清一先生的研究，【註一】五十年代有安志敏先生的分類，【註二】饒惠元先生的概

述；【註三】六十年代有石毛道直先生以稻作採收和石刀為主題所作的研究；【註四】八十年代佟柱臣先生的綜合性研究。【註五】均以工具性質之石刀作為討論的對象；西方學者則自二、三十年代以來，也有一些論述，【註六】也以工具性質為主；這一類作為生產工具使用的石刀，大多取當地或鄰近地區所產之石材製作，作成長方形，長度約十公分左右，近刀背或刀中軸或近刃線處，鑽一或二孔，便於人手的掌握，刃有雙面刃、單面刃、平刃、凸孤刃、凹孤刃等，一般出於居住址或灰坑，大多有使用痕跡或傷損，普遍使用於黃河中、上游，以粟、稷為主要農作物的地區，其使用的時間甚早，大約在仰韶文化早期已甚普遍，而以廟底溝期最為盛行。【註七】

七十年代後半，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大宗的多孔石、玉刀，有不少長度超過三十公分的，五十公分的大刀亦有之。以後陸續在西北地區均有發現，【註八】此類石、玉刀的特色，不僅在其製作當時所賦予的文化意義，例如沿著刀背所鑽的多孔，孔數由三至五不等，或有更多者；更在其成器之後，累積加上的豐富文化記號，例如加刨窪弧或剖切成薄片狀等。而江淮地區的北陰陽營遺址、薛家崗遺址也出土有多孔石刀，以孔數的規律性而引人注目；八十年代林巴奈夫先生曾就出土

【註一】：水野清一〈石庖丁—北支那の新石器〉《考古學》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三七）。

【註二】：安志敏〈中國古代的石刀〉《中國新石器時代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一七二～一九四。

【註三】：饒惠元〈略論長方形有孔石刀〉《考古》一九五八年第五期頁四〇～四五。

【註四】：石毛直道〈日本稻作の系譜（上）—稻の收穫法—〉《史林》第五一卷第五號（一九六八）頁一三〇～一五〇；〈日本稻作の系譜（下）—石庖丁について—〉《史林》第五一卷第五號（一九六八）頁九六～一二六。

【註五】：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複合工具的研究〉、〈黃河中下游新石器時代工具的研究〉、〈仰韶、龍山文化石質工具的工藝研究〉、〈仰韶、龍山文化工具的使用痕跡和力學上的研究〉均收錄於《中國東北地區和新石器時代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

【註六】：Hansford S. Howard. *Chinese Carved Jades*. (London: Faber & Faber, 1968); Loehr Max.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Grenville L. Winthrop Collection*. (Cambridge, Mass.: The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註七】：嚴文明〈安徽新石器文化發展譜系的初步觀察〉《文物研究》第五輯（一九八九）頁四三。

【註八】：戴應新〈陝西神木石峁龍山文化遺址調查〉《考古》一九七七年第三期頁一五四～一五七；〈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五、六期頁二二九～二五〇。

的、散藏於歐、美、日各大博物館之多孔石、玉刀，作了編年和研究；【註九】多孔石、玉刀的問題，開始成爲各方關注的焦點；然繼林氏之後，似乎不見有其他有系統的研究；【註一〇】筆者於九四年曾就二里頭三、四期所出之石、玉刀，提出「刀尺」論的臆說，【註一一】唯當時宥於主題，並沒有作詳細的論證。此類多孔石、玉刀，由其製作以及出土情況觀之，與上述工具性質之石刀不同，顯非實際作爲生計工具，推測是一種象徵意義極強的玉兵。【註一二】本文所欲討論的多孔石、玉刀即以此一性質者爲對象。

在進入主題之前，有幾個觀念性的看法，在此先提出來說明，本文所討論的多孔石、玉刀，是筆者近年來，一直在進行的「中國古代的墓葬『玉兵』」系列文之一；所謂「玉兵」，請參見筆者在一篇專文中所詳細定義的；【註一三】它與一般有實際生計功能的工具，在形制上、名稱上雖是相通的，此乃因其基本的結構與這些工具相同之故，然在性質上、使用方式上，則又與工具者全然迥異；即便有少數墓葬玉兵是墓主生前的生計工具，但一般玉兵皆屬象徵性之儀式用器，器身很少見有使用傷痕的。

然此類玉兵，一經發掘出土之後，考古工作者常依一般工具之形制給予命名，並不太考慮其特殊的屬性；而少數不當之名稱，往往造成讀者的誤解；例如歷來爭議較多的名稱「柄形器」，一般人常望文生義，認爲一種常見於二里頭文化至西周墓葬遺址的扁長條形玉器，是某種器物的柄，事實上恐怕不是此一回事。又如本文即將討論的北陰陽營遺址所出的「七孔石

【註九】：林巴奈夫〈中國古代の石庖丁形玉器と骨鏟形玉器〉（《中國古玉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頁四三三～五一四。

【註一〇】：Ja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5)；

Sam Bernstein. "Neolithic jade blades: feast and ritual," *Orientalia*, v.24, no.12, pp.59-61.

鄧淑蘋〈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三)〉《故宮文物月刊》第一一卷第七期（一九九三）頁八六～九三。

【註一一】：Yang Mei-ji. "Jade style of Erh-li-tou Culture," *Chinese Jades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18]*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6) pp.77-97.

【註一二】：對玉兵的詮釋請參見楊美莉〈中國古代墓葬的「玉兵」〉《故宮學術季刊》第一三卷第四期（一九九六）頁九三～一七二之前言的部分。

【註一三】：同【註十二】頁九三～九六。

刀」，恐怕真正還是屬於斧形玉兵的變形；六十年代以來，西方考古界一致的共識是，考古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考古工作者必須具備多種的才能以及知識，【註一四】方能勝任其工作，並給予所發掘之物適切的名稱和分類；而中國的考古工作者，在這一方面的訓練尚嫌不足；【註一五】也因此有些的考古記錄不夠嚴謹。因此，在使用考古資料的同時，應能分辨出資料的適切與否。

其次的一點是，一旦一些石質的工具，發展至作為禮器的玉兵時，玉兵的製作已脫離該器物的母型器所加諸其上的限制，而在為了彰顯其特殊的神性或權威性之前提下，可能添加了不少屬於非生計功能之因素，例如石峁玉兵的長與大、山東龍山文化玉兵的超薄、良渚文化玉兵的繁瑣配備等；因此，玉兵的製作，原始功能的要求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複雜的象徵意義之溶合，即為集藝術、政治、宗教於一身之物了。【註一六】因此玉兵的製作，往往受到同一時期各類玉兵形制，以及個別製作經驗上的相互影響；也可能加入玉匠或支助者個人的主觀意念，或受到當時一種審美觀、禮神觀的左右等等；因此，對玉兵的認識，絕不是原始母型器所給予的名稱，例如「刀」、「斧」所能概括的，其複雜的人文因素的糅合，是需要敏銳而細心去梳理的。這一點也是筆者在討論石峁類型的多孔玉刀時，特別強調的一個觀念。

貫穿本文，上述的二個觀念，雖不是論述的主旨，然卻是論述過程中極其重要的觀念，而筆者花了不少筆墨作了闡述，無異是想幫助讀者容易地進入本文所討論的主題。多孔玉刀的研究是一個複雜而極富挑戰性的課題，本文雖然冗長，然仍有未盡之言，可見其亦是一個極有發展性的研究主題；筆者在充裕的時間內完成了此一論文，相信尚有不少不周之處，還請方家不吝指正。

按目前出土有多孔石、玉刀的地區文化，有位於長江中、下游區的南京北陰陽營文化二期（3500~3200 B. C.）、安徽薛

【註一四】：格雷厄姆·克拉克一九六九、保羅·斯馬丁、路易斯·賓福德一九六二。收錄於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當代國外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九一）。

【註一五】：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臺北市：稻鄉出版社，一九八八）。

【註一六】：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臺北市：聯經出版社，一九九〇）頁九九、一一一。

若較之其他墓葬，隨葬物中的動物牙、角器顯然較多，推測墓主可能是一個強有力的男子，善於狩獵；而除了鹿牙床和鹿角、豬下頷骨可以作為強者的象徵之外，二對雕刻的豬獠牙，以及一對製作精緻的七孔石刀，也能反映墓主除了擁有雄厚的武力之外，並享有一般常人沒有的特殊權利，推知墓主當為擁有特殊地位、身分者。而七孔石刀也正是一種象徵權利、身分的玉兵。【註一八】

南京北陰陽營遺址，地處於江淮水系的東端，臨近太湖地區，其主要的農作物仍以稻作為主；稻作的採收，在河姆渡文化以及一些東南沿海地區，一般推測是不使用石刀的；【註一九】而北陰陽營文化遺址，截至目前為止的考古發掘，也未見有長方形石刀出土，推測也是不使用長方形石刀作為主要生計工具的；一三一號墓所出的二件七孔石刀，沒有使用痕跡，推測非為實際的生計工具；那麼這種製作精緻的多孔石刀，是否為北陰陽營文化本土之物？抑是外來之物？

今仔細分析這兩件七孔石刀之形制、材質，卻也非外來物，乃是受此地區發展紛繁的斧形玉兵的刺激，特別製作的，一種屬於斧形玉兵的變化型。石刀以花崗岩製成，刀背平整，刃部稍寬並作凸弧刃，器身近刀背處有一排等距的七孔，由中間的孔向兩邊，孔有逐漸變小的趨勢，整排孔作優雅的弧線排列，孔系管鑽，兩面對鑽而成，刀中部稍厚，剖面呈梭形，（與斧的剖面相似）長二·四、三、高六·一、厚一·一公分。（圖二）兩件形制、大小雷同，成對隨葬於墓主腰側。

北陰陽營遺址出土之石器中，製作較精整且大型者，大多以花崗岩為之，花崗岩的使用量僅次於凝灰岩、輝長岩，【註二〇】例如一件製作精整的穿孔石斧，（圖三）為墓葬所出，長二一·三、寬二三、厚一·三公分，也是以花崗岩為之，其

【註一八】：以豬獠牙或獐牙隨葬，在大汶口文化的大型墓葬中是常見的，推測隨葬有此一類物的墓主，應屬社會地位、身分較高者。而北陰陽營遺址一三一號墓也有二對豬獠牙隨葬，推測其身分與地位應也是較高的。

【註一九】：林華東先生由河姆渡遺址沒有出土鐮具等收割稻穗的工具，推測河姆渡人收割水稻時，可能是用手摘取稻穗，或用蚌殼割取（林華東《河姆渡文化初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一六八）；石毛道直先生在調查以及整理有關東南亞、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之考古報告之後，發現此一些地區不出土石刀，推測當時採收稻穗是不使用石刀的（石毛直道《日本稻作の系譜（上）——稻の收穫法——》《史林》第五一卷第五號（一九六八）頁一三四）。而北陰陽營遺址亦是不出石刀或鐮刀的，因此，推測北陰陽營文化是一個不以石刀作為主要生計工具的文化。

【註二〇】：同【註一七】頁三二，表五。

大小與七孔石刀不相上下，應是與七孔石刀同一性質之物。再者，就北陰陽營遺址所出的五五四件石質工具而言，以石斧、石鏃占大宗，且類型繁多，其次是石鑿等端刃器，可知斧形器是北陰陽營文化重要的生計工具，因此七孔石刀的製作意念，勿寧還是來自於此一文化發展多式多樣的斧形器的靈感；在出土的穿孔石斧中，有一型，背略弧鼓，兩側弧出，刃端微外侈，凸弧刃，有一較大的孔鑲於背與器中間的位置上；（圖四）此型器在北陰陽營遺址二期共出有三件；平均長度在十二、三公分左右；若將此型石斧向兩側延長發展，近背緣有規律的加鑽多孔，恐怕就成了七孔石刀了；因此北陰陽營遺址二期墓葬所出的兩件七孔石刀，推測是製作特別而精緻的多孔石斧之變形；加上，七孔石刀出土時，無任何使用傷痕，（指其作為刀的功能）推測其純屬象徵性之禮器，因此，以其稱作「七孔石刀」，筆者倒建議稱作「七孔石鋌」來得恰當，就如青銅時代所製作的一種多孔鋌，（圖五）作為儀式性之禮器。

接下來我們即將面臨的一個疑問是，為什麼一定作出七孔？這七孔有無其他的文化意義？據目前的考古發掘，最早有意識地作七個孔的文化，是河南舞陽賈湖類型文化，賈湖遺址於一九八四、八七年間發掘出土十餘件七孔骨笛，其音律經專家的測音，七音階的發音均極為準確，（圖六）【註二一】賈湖的年代早於仰韶文化，約6000~5000 B. C.，主要分布於淮河中、上游的支流沙河、洪河流域，涵蓋的範圍，西邊至豫西南，東邊可能及於皖中地區，【註二二】當然我們並不勉強牽繫北陰陽營所出之七孔石刀與賈湖的七孔骨笛之間的關係，況且兩個文化前後相差有二千年之久；然蘇皖平原藉由江淮水系的溝通，似乎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即與黃河中、下游的古老文化有密切的往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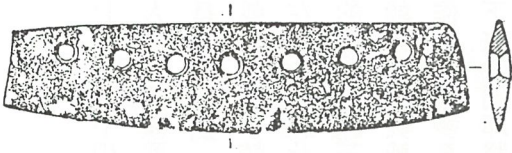
巫鴻先生在一篇討論徐州地區的古文化中，以蘇北邳縣劉林大墩子文化所出帶有濃厚的廟底溝色彩的彩陶為據，認為此一地區，在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期，曾是黃河中游文化向東發展的重要通道。【註二三】也即意味著，早在仰韶文化早、中

【註二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一期頁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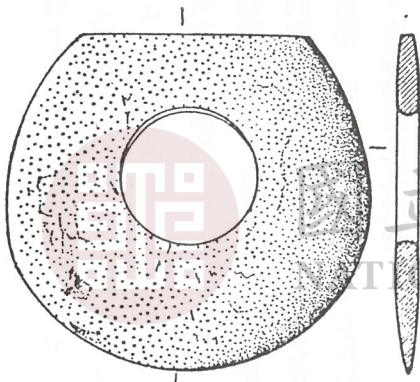
黃翔鵬〈舞陽賈湖骨笛的測音研究〉《文物》一九八九第一期頁一五、一七。

【註二二】：張居中〈試論賈湖類型的特徵及與周圍文化的關係〉《文物》一九八九第二期頁一八、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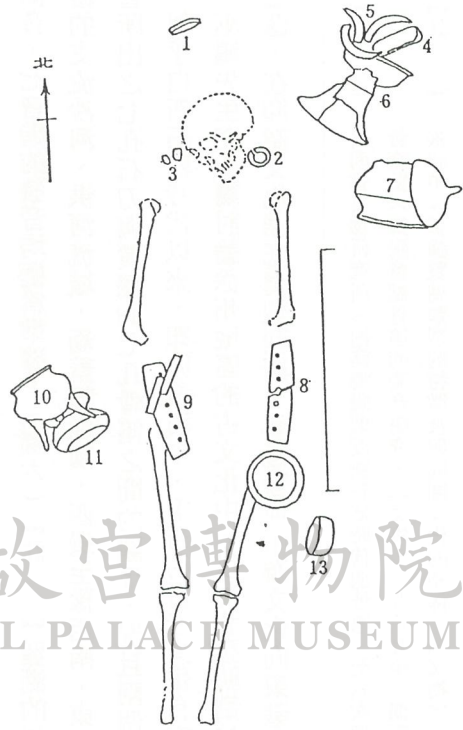
【註二三】：Wu Hung, "The art of Xuzhou: a regional approach" *Oriental Art* v. 21, no. 10 (Oct.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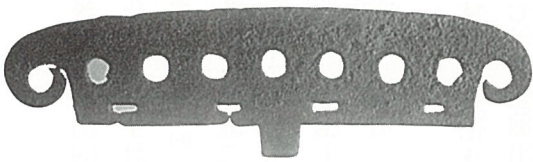
圖二 七孔石刀 北陰陽營文化 長 24.3 公分 北陰陽營遺址出土 (摘自《北陰陽營》頁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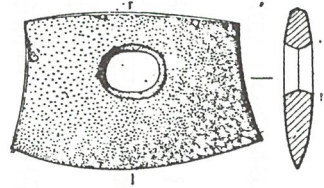
圖三 穿孔石斧 北陰陽營文化 長 21.3 公分 北陰陽營遺址出土 (摘自《北陰陽營》頁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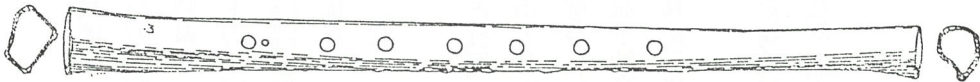
圖一 北陰陽營遺址 131 號墓出土遺物分布圖 (摘自《北陰陽營》頁 25)



圖五 銅鉞 卡約文化 青海循化縣阿哈特拉出土 (摘自《青海文物》圖 56)



圖四 穿孔石斧 北陰陽營文化 北陰陽營遺址出土 (摘自《北陰陽營》頁 31)



圖六 七孔骨苗 舞陽賈湖類型文化 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 (摘自《文物》1989/1)

期，黃河中游的文化已與江淮地區的文化有過互動的關係。【註二四】而地處於江淮水系區東端的南京北陰陽營文化，是經由蘇北或經由皖北，接受了仰韶文化或更早的賈湖類型文化的傳統因素？仍有待更多考古發掘資料的證實。

藉由江淮水系的帶動，估計黃河中游的文化會順著長江流域，及於安徽含山凌家灘、潛山薛家崗等重要文化區。今日在江蘇與安徽的省界，在新石器時代並不存在的，這一大片江淮水域，河流、湖泊密布，各地間的往來，經由水路是相當容易的，甚至及於贛北。在幾近相同環境下的此一地區文化，當接受來自於同一外來文化之刺激時，勢必會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反應，而這種共同的文化反應，表現成共同的文化符號，今我們可以追蹤這種符號的軌跡，推知此一外來文化傳播的路線或範圍。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符號，是普遍存在於江淮水系地區文化中的八角星紋。

八角星紋正是南北文化交融的指標，這種以直線、斜線與尖銳的角所構成的圖案，是江淮水系地區文化，對來自於黃河中游的，以柔和的曲、弧線所構成的花葉紋圖案的一種反動。由八角星紋出現的遺址，可以看出江淮水系所帶動的外來文化種子，曾經散播在那些地區。而在陶器上彩繪花紋，一般認為以黃河中游（尤其是渭水）仰韶文化為較早，而當廟底溝的先民將極具代表性的花葉紋帶向東邊之後，固然江淮地區的先民一方面接受了此一異文化的產物，然同時他們也利用此一技術，開始繪出屬於自己本土風味的圖案來；「八角星紋」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成形的文化結晶；而經由這種圖案表現對外來文化強烈的反彈，以及對自己本土文化的固守，正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存在有八角星紋的文化，是曾經受到廟底溝期仰韶文化刺激的文化。

而事實似乎也是如此，八角星紋出現的範圍，北至魯南、蘇北，南抵贛北，大凡有八角星紋的文化，都同時存在有廟底溝類型的因素；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一陶片，上繪有八角星紋，星紋的中央為空的方形；（圖七）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山東鄒縣野店墓葬遺址亦出土有彩繪八角星紋的陶盆；三五號墓出土一件陶盆，環腹彩繪有八角星紋和橢圓圈紋，八角星

【註二四】：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臺北市：聯經出版社，一九九五）頁五一。張光直先生認為華北新石器時代文化沿著三條主要路線南下，一為渭水上游及嘉陵江入四川盆地；二為沿漢水入雲夢湖區；三為沿海岸東南下。

紋的中央是空的長方形。(圖八)魯南的大汶口文化有廟底溝類型文化的因素，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山東兗州王因遺址出土有廟底溝類型的彩陶花紋是最好的說明。(圖九)

一九六三年江蘇邳縣四戶鎮大墩子遺址上層出土三件陶紡輪，其中一件的表面刻畫有八角星紋；(圖一〇)另在四號墓出土的一件彩陶盆，環腹繪有八角星紋，(圖一一)此一八角星紋與前述的紡輪上所劃之八角星紋，略為不同，中心為方形。而一件出於三三號墓的彩陶甌，器蓋面彩繪近似八角星紋的圖案；(圖一二)大墩子遺址同時出土廟底溝類型的彩陶。(圖一三)

上海青浦崧澤文化遺址，中層三三號墓出土二件陶壺，壺底壓畫八角星紋，中間為菱形紋，(圖一四)而同屬中層的探方中出土一件盆形豆，在器座下部刻畫一圈八角星紋，中央畫X紋。(圖一五)北陰陽營遺址五一號墓出土一件陶盆，盆內繪八角星紋之變形圖案，中央作一長方形。(圖一六)而北陰陽營文化遺址亦出土有廟底溝類型的彩陶。(圖一七)

一九八七年在南京偏西南邊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一件罕見的玉版，版面上刻畫兩個同心圓，內圓中刻劃八角星紋，八角星紋的中央無任何圖案，外圓內等分成八個扇格，每一扇格內刻劃一箭頭形，外圓外四個角落再各刻劃一個箭頭，長方形玉版外緣四邊各鑽不等數的孔；(圖一八)此一圖形一般均認為是與天文有關之圖案。【註二五】

安徽潛山薛家崗文化三期遺址，出土一件陶器蓋，蓋鈕即作成八角星形的齒輪紐；(圖一九)另外，同屬於薛家崗二期、三期的安徽宿松黃鱗嘴遺址出土的一件陶器蓋，亦有展開的八角星紋；(圖二〇)甚至於江西靖安出土的一件陶紡輪，其器面上也繪有八角星紋，中央作一圓圈。(圖二一)而在皖南的薛家崗三期彩繪石器上的花紋，則屬廟底溝類型文化之花葉紋的變形，此留待後面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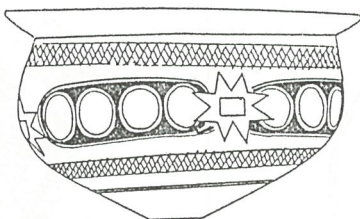
由上述出土有八角星紋的遺址，大多有廟底溝的花葉紋之遺物，尤其是蘇北的邳縣大墩子遺址、潛山的薛家崗遺址所出遺物上所表現的花葉紋題材，更加强了八角星紋在江淮地區存在的特殊意義。然各個文化表現此花紋時，又在細部上呈現個

【註二五】：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灘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九年第四期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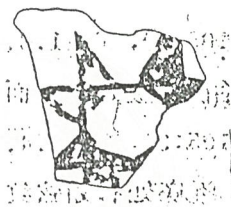
陳久金、張敬國《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文物》一九八九年第四期頁一四、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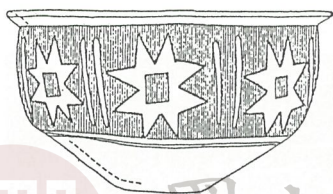
圖一〇 刻畫八角星紋的陶紡輪 大汶口文化 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6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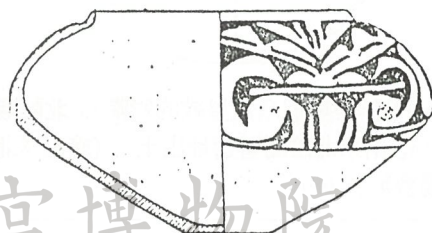
圖八 彩繪八角星紋的陶盆 大汶口文化晚期 山東鄒縣野店出土 (摘自《鄒縣野店》頁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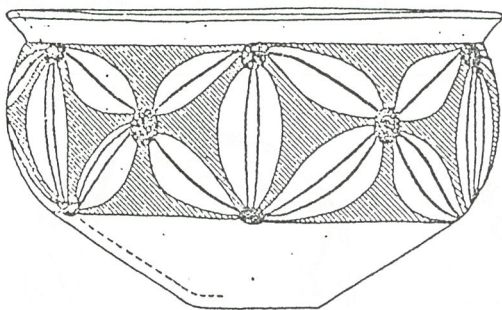
圖七 刻有八角星紋的陶片 大汶口文化 山東泰安大汶口出土 (摘自《大汶口》頁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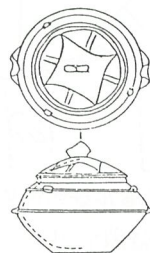
圖一一 彩繪八角星紋的彩陶盆 大汶口文化 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64/2)



圖九 彩繪花葉紋的陶器 大汶口文化 山東兗州王因出土 (摘自《考古》1979/1)



圖一三 彩繪花葉紋的彩陶 大汶口文化 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6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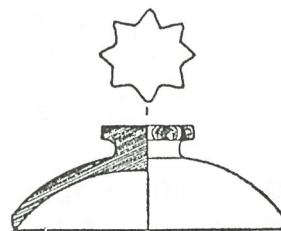
圖一二 彩繪近似八角星紋的彩陶甌 大汶口文化 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6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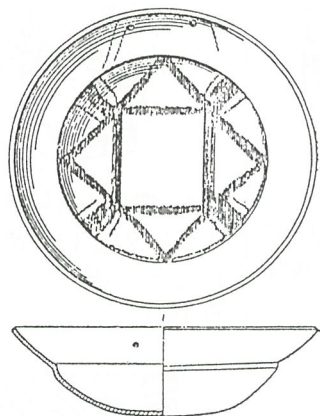


圖一九 刻有展開的八角星紋之陶器蓋 薛家崗文化三期 安徽潛山薛家崗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82/3)



圖二一 繪有八角星紋的陶紡輪 新石器時代晚期 江西靖安遺址出土 (摘自《江西歷史文物》19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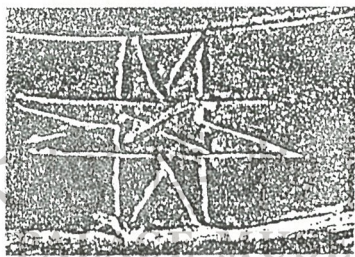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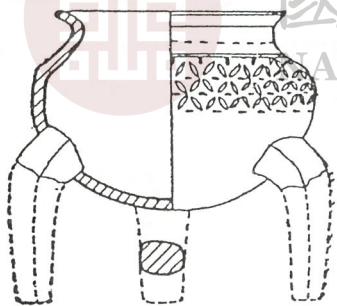
圖一六 彩繪變形八角星紋的彩陶盆 北陰陽營文化 南京北陰陽營遺址出土 (摘自《北陰陽營》頁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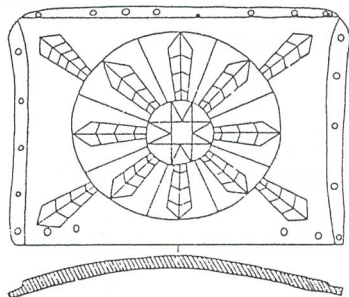
圖一四 刻畫八角星紋的彩陶壺 崧澤文化 上海青浦崧澤遺址出土 (摘自《崧澤》圖版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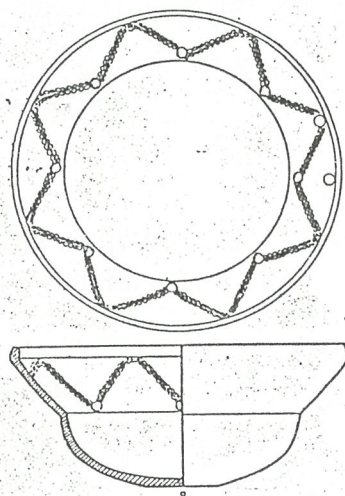
圖一五 刻畫八角星紋的彩陶豆 崧澤文化 上海青浦崧澤遺址出土 (摘自《崧澤》圖版 70)



圖一七 彩繪花葉紋的彩陶 北陰陽營文化 南京北陰陽營遺址出土 (摘自《北陰陽營》頁 41)



圖一八 刻有八角星紋的玉版 新石器時代晚期 安徽含山凌家灘出土 (摘自《文物》1989/4)



圖二〇 繪有展開的八角星紋之陶鉢 薛家崗文化二、三期 安徽宿松黃鱗嘴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87/4)

別的差異性，尤其是在八角星紋的中央部分；而究竟八角星紋象徵何意？眾說紛紜。【註二六】

凌家灘所出的長方形玉版內刻畫的八角星紋，可能是強烈影響學者們對八角星紋解釋的珍貴之物；其將此一圖案導向於表示「方位」、「數理關係」等的天文意義之解釋上；【註二七】而如王育成先生認為是表示龜腹甲的特殊符號；【註二八】亦因玉版出土時，是夾於一組龜甲中之故。今姑不論此八角星紋的實際意義為何？且見其出現的地區，包括魯南、蘇北，以及江淮水域，均是受到仰韶文化，尤其是廟底溝類型文化影響的地區。如此，似乎可以推測，北陰陽營之七孔石刀，甚至於下面即將討論的薛家崗文化三期所製作的奇數孔石刀，其孔數的來源，有可能是來自於比廟底溝更接近江淮地區的舞陽賈湖之音律知識的傳統。

總之，北陰陽營一三一號墓出土的兩件七孔石刀，推測是賈湖類型文化以來，七數字的傳統之延續，此一數字被當時人認為與天文、音律均有關；因此，是不是在北陰陽營的先民窮盡心思，創作更多類型之斧形玉兵之際，將賈湖的七孔意念，加入其創作的思考領域，於是創作出獨具一格的七孔石刀，更加強其文化的豐富性。而推測在當時能懂得天文、音律的人，當屬特殊階級者，因此陪葬此一對七孔石刀的墓主，除了本身具有強大的武力外，也是一個可以解釋天象、曆算，並有決事權者。

2. 薛家崗文化三期的多孔石刀

薛家崗三期墓葬中，凡是隨葬多孔石刀的大墓，皆隨葬有二件以上的石、玉鏹或鉞，以及較多量的玉飾；而隨葬一或二件石鏹的中型墓，則已不隨葬多孔石刀了；小型墓更不必多提了。推測多孔石刀是某種身分、地位者的專用物。以四四號墓為例，在墓主身側隨葬四件多孔石刀，分別是十三孔、十一孔、五孔、三孔各一件，石鏹三件、玉鏹一件、石鏹一件、玉璜

【註二六】：王籽〈八角星紋與史前織機〉《中國文化》第二輯（一九九〇）頁八四、九四。

【註二七】：饒宗頤〈未有文字以前表示「方位」與「數理關係」的玉版——含山出土玉版小論〉《文物研究》第六輯（一九九〇）頁四八、五二。

【註二八】：王育成〈含山玉龜及玉片八角形來源考〉《文物》一九九二年第四期頁五六、六一。

二件、玉環一件、玉飾三十件等。【註二九】（圖二二）比起其他同期墓，此墓是規模大者。推測多孔石刀仍屬特殊階層人之物。

三期墓葬遺址出土多孔石刀共三十六件，其中單孔二件，三孔十三件，五孔七件，七孔五件，九孔四件，十一孔三件，十三孔一件，分別是以奇數累進的孔數；最長者為十三孔石刀，長五一·六公分。（圖二三）大多為泥質頁岩製成，體扁薄，長條形，平背，一端較窄，近刀背處鑽孔，有單面鑽與兩面對鑽，孔皆為奇數，孔間距相等，刃部鋒利，平刃或略凹弧刃；其中有二件九孔石刀在孔下圍彩繪花果紋。【註三〇】

若從形制觀之，薛家崗所出之多孔石刀的基型，接近同期墓葬所出的一型石鏟，（圖二四）此型石鏟，平背，兩側微不對稱地斜出，刃端略外侈，平刃鋒利，一孔鑽於近背端；若將多孔石刀中的單孔者與此型石鏟比較，兩者在形制上差距不大。

而由單孔至十三孔的排列，推測是薛家崗先民發展彩繪二方連續花果紋下的產物；一件彩繪有花果紋的石鏟，（圖二五）在穿孔下繪有一組花果紋，花果紋兩側的空間，連續性地各彩繪半個花果紋；薛家崗的先民使用這種二方連續花果紋與鑽出來的圓孔巧妙的結合，創造了一種石、玉器上特有的裝飾花紋，隨著連續花紋的發展，孔數也以累進數增加，於是一、三、五、七……等奇數孔就依序出現在石刀的背緣處。二件九孔石刀，在孔下圍同樣地裝飾有一組組的花果紋，（圖二六）而在器兩側的空間上，也作出半個的花果紋。因此，薛家崗三期墓葬所出的奇數孔石刀，是在形制與花紋巧妙的結合下成就的。

若再從薛家崗文化出土之遺物的種類觀之，薛家崗文化似乎也是一個不興製作石刀的文化，其石質工具仍以斧形器的鏟、鉞以及鏃、鏝為主，【註三一】而此一宗奇數孔的石刀，尤其是七、十三孔的石刀，實際上也是潛山的薛家崗三期墓葬所獨有的。

【註二九】：安徽省文物工作隊〈潛山薛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三期頁三〇九、三一。

【註三〇】：同【註二九】頁三一〇。

【註三一】：同【註二九】頁三〇八、三一一。

一、五孔的石刀，在薛家崗文化分布的範圍內，例如太湖的何家凸、岳西的祠堂崗、望江、懷寧等縣均有零星的出土例。【註三二】望江楓嶺墩遺址，出土一件五孔石刀和一件雙孔石刀；五孔石刀長約一九、寬約七·一公分，整體風格與前述的薛家崗多孔石刀者接近，唯其刃線的斜度沒有前者大；【註三三】（圖二七）雙孔石刀是薛家崗文化中，唯一的偶數孔石刀，也有較大型者；桐城縣文物管理所採集到一件，長四四·七、寬端一二、窄端七·二公分的雙孔大石刀；【註三四】然大多數的雙孔石刀皆為較小型者，如楓嶺墩所出之雙孔石刀，長度約在十公分左右。這些石刀也許是引發薛家崗先民製作出一套，排列有序，全部是奇數孔的多孔石刀的引子，然誠如我們在前言部分提出的，玉兵器類之間是會相互影響的；因此，我們也不排除單孔而繪有花果紋的石、玉鉞，是他們發現順著連續花果紋的增加，即可製作出奇數孔石刀的靈思源頭。

而奇數孔對薛家崗的先民而言，究竟有何意義？奇數孔石刀究竟有何功能？固然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出，奇數孔的排列，或許是順著連續花果紋的增加，加上爲了講求兩邊對稱性而產生的；然似乎也不是如此單純的一個意念使然；一九九六年初，筆者親自到了安徽省考古所以及安徽省博物館，承蒙所內先生們的美意，讓筆者上手了一部分多孔石刀；大體看來，這一宗的多孔石刀的刃部並沒有使用傷，因此推測是不執行生計的刀功能的，正是一種表徵擁有者身分、地位之玉兵；其孔數的階級化，正代表身分、地位的階級化。

而薛家崗的奇數觀念，是否是此一地區長久以來，累積發展的曆算觀念使然。當然我們並沒有直接的證據證實此一假說，然由一些同時出土之遺物，似乎也可以輔證之。在出土奇數孔石刀的三期文化層中，同時也出土有六十九件的陶球，其中有六十二個球是空心而鑲有圓孔的；一般認爲薛家崗三期製作的陶球，是來自於屈家嶺文化的；【註三五】然仔細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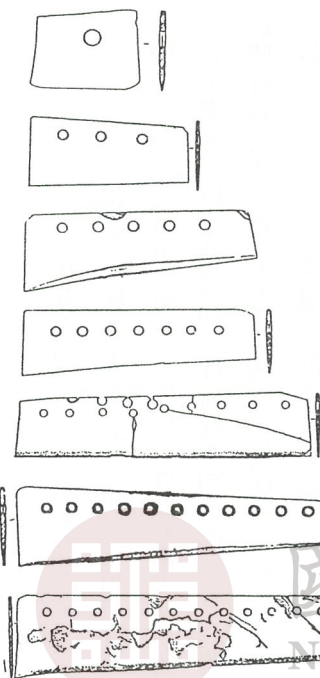
【註三二】：楊德標〈安徽江淮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文物研究》第七輯（一九九一）頁一四一。

【註三三】：望江縣文物管理所〈安徽望江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考古》一九八八年第六期頁四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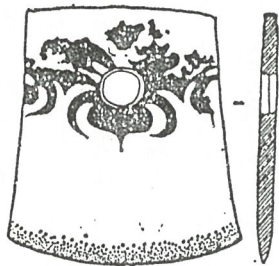
【註三四】：楊立新〈薛家崗文化淺析〉《文物研究》第六輯（一九九〇）頁六〇。

楊德標〈安徽江淮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文物研究》第七輯（一九九一）頁一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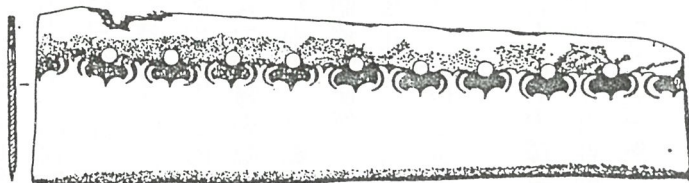
【註三五】：楊立新〈薛家崗文化淺析〉《文物研究》第六輯（一九九〇）頁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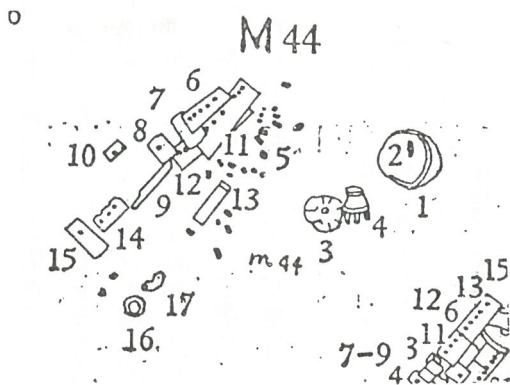
圖二三 薛家崗遺址出土的奇數孔石刀
(摘自《考古學報》198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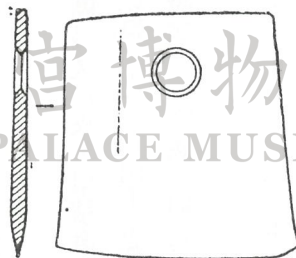
圖二五 彩繪花果紋石鏟 薛家崗文化三期
安徽潛山薛家崗出土 (摘自《考古學
報》198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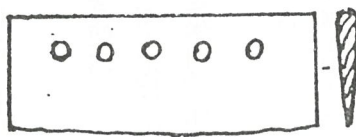
圖二六 彩繪花果紋九孔石刀 薛家崗文化三期 安徽潛山薛家崗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82/3)



圖二二 安徽潛山薛家崗遺址 44 號墓出土物
分布圖 (摘自《考古學報》1982/3)



圖二四 石鏟 薛家崗文化三期 安徽潛山薛家
崗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82/3)



圖二七 五孔石刀 薛家崗文化三期 安徽望江
楓嶺墩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88/6)

薛家崗所出陶球，在鑽孔上的靈活應用，以及準確而有數算根據的製作，是屈家嶺文化所望塵莫及的。這些鏤有圓孔的陶球，孔數由二至三十六不等。【註三六】例如圖二八的陶球，在球面上先作出三個大圓，在每二、三個大圓的交點上即鏤一孔，如此可得六個孔，再於三個大圓所隔出的八個空間中心鏤一孔，可鏤得八孔，合計十四孔；其他尚有更繁而有序的鏤孔，但皆是有數算上的根據的；因此薛家崗文化三期遺物上的鑽孔或鏤孔，在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一文化精深的曆算知識。此處筆者還是重申前言部分所提出的觀念，即一件玉兵的象徵意義是累積、沉澱多少先民的知識而來的，而其形制的塑成也是多少先民智慧的溶合。總之，玉兵本身已非單純地稱作「刀」或「斧」可以詮釋的對象了。

而同屬於薛家崗文化二、三期的宿松黃鱗嘴遺址，出土的一件陶杯紐蓋，（參見圖二〇）環腹部作出一個八角紋，每一定點的取位，極為準確；此若沒有精確的計算、測量技術是很難作出的；【註三七】此一八角紋，在前節也曾提及，是江淮水系區普遍存在的八角星紋之活用。薛家崗先民已能將典型的八角星紋作解體，而展現一種靈活而合乎幾何學的八角圖案，其準確的算學和測量技術，是上述幾個出土有八角星紋的文化所不及的。

綜上述的論證，推測薛家崗三期的先民製作如此有規律的奇數孔石刀，是有其文化上的意義的；其對累進數字的熱衷，以及對曆算發展的不遺餘力，不但反映了薛家崗文化與豫、蘇地區間，甚至與魯南文化間的文化互動關係，也展現出其文化本身的原創力極強。誠如嚴文明先生在一篇〈安徽新石器文化發展譜系的初步觀察〉文中所提出的，安徽、淮北並不是一直作為一個獨立而穩定的文化區而存在的；【註三八】言下之意，似乎仍暗示著安徽、淮北地區是一個西北文化與東南文化的轉換區。

而事實上，不僅奇數孔石刀印證了此一南北文化交溶的事實，薛家崗的花果紋也同樣有力地證明了此一事實；花果紋的母型應是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的花葉紋，廟底溝類型文化約於4000 B. C. 左右傳播至蘇北、魯南、皖東北交匯帶的徐州地區，

【註三六】：同【註三四】一九八二年的報告記載鏤孔陶球之孔數由一、三六，但楊立新的文中則記由二、三六孔。

【註三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松黃鱗嘴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一九八七年第四期頁四六五、四六六。

【註三八】：嚴文明〈安徽新石器文化發展譜系的初步觀察〉《文物研究》第五輯（一九八九）頁四三。

【註三九】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除了出土有本土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風格之陶器之外，也同時出土有廟底溝類型的花葉紋彩陶，（參見圖一三）此型花紋，常以一實心圓作花芯，向四周作出對稱的放射性花瓣紋，花瓣紋大多鉤勒出中軸脈，每一花瓣極富於變化性，在廟底溝的此類花紋，常見左右作側面形花瓣，上下作出較扁的正面形；並有各種方向與角度的變化，極生動活潑。

大墩子的花瓣紋較之廟底溝者來得形式化些；而山東兗州王因遺址亦出土有類似的花瓣紋，（參見圖八）這些傳播至蘇北、魯南地區的彩繪花葉紋是否即是薛家崗獨特的花果紋的藍本？或是薛家崗文化直接由廟底溝接受了其花葉紋的裝飾主題？細審薛家崗三期石鏟、石刀上所繪的花果紋，有一象徵花芯的圓，此圓即是石鏟或石刀上所鑽的圓孔，在背部按上柄，柄必須以繩索斜上固定在孔上方，因此其花紋的設計，就局限於孔的下圍，以及沿著繩索斜上的空間；薛家崗的花果紋是配合石鏟安柄後的形狀，將花葉紋作調整設計出來的；然若就長五十餘公分的多孔石刀而言，推測是不裝柄的，其花紋的設計不必以孔下圍空間為主，但是這兒我們仍見其花紋尚保留石鏟帶柄時的設計考慮；再仔細分析薛家崗花果紋的結構，象徵果實而位於孔正下方的圖形，在廟底溝、大墩子均已存在；而薛家崗花果紋在動態的表現上不及廟底溝者，較接近大墩子或兗州者，推測薛家崗文化，尤其是三期，可能接受來自於蘇北、魯南的廟底溝類型文化因素。

那麼薛家崗三期所出之奇數孔石刀，作為幾個大型墓的隨葬品，其在該文化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一般而言，出土有多孔石刀的墓，大多與石鏟、石鉞、石鏹等同出，【註四〇】因此應是有強大生產力者所擁有之物；而既然石刀在整個江淮地區，在良渚文化期以前，並不是普遍存在的生計工具，那麼誠如我們在前面所提出的看法，其在北陰陽營和薛家崗文化中，特殊的少量出土例，更顯出其特殊性。其富含豐富的文化意義，以及形制上的特徵，均非單純的一種生計工具之延長所能解釋的；推測它受到當時當地發展隆盛的斧形玉兵形制，以及一些傳統的天文、曆算觀念的啓發與影響。

【註三九】：同【註二三】。

【註四〇】：同【註二九】頁一九六。

致於薛家崗的奇數孔石刀是否當作「刀尺」使用？筆者先前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這樣的一個想法，【註四一】今若由其有意識地作等距離的奇數孔，以及此一地區長久以來的天文、曆算的傳統觀之，此一說法也是極有發展性的。唯目前尚無直接的證據可資證明。若其孔數象徵一種身分、地位，那麼具有此一身分、地位的人，又能掌握尺度萬物之權，就更彰顯他的重要地位了。

3. 咎廟類型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多孔石、玉刀

必然地，我們會認為北陰陽營多孔石刀的製作，對江淮地區在往後石、玉刀的製作將有關鍵性的影響；然事實似乎也不盡然，此處我們仍不能忽略的兩個重要的因素：(一)長江下游區盛行的斧形玉兵的強勢性；(二)黃河中、上游的石刀文化，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一直點點滴滴地滲入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同期文化中；【註四二】尤其對此一地區雙孔、三孔石刀的發展，似乎第一項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大致看來，無論是咎廟類型文化或良渚文化遺址所出的多孔石、玉刀，其上下的寬幅與左右的長幅之比例，一般是較接近一比一的比例關係的，若比較黃河中、上游區所出之石刀的比例，前者屬寬闊型，後者則屬橫長條型，因此，其基形多少仍帶有斧形器的影子。

咎廟類型文化，一般訂其年代相當於北陰陽營三、四期，其涵蓋的範圍包括太湖以西的蘇皖平原地區。【註四三】目前有關此一類型文化之資料，尚不全面，因此對於此二類型文化的認識，亦頗為零散。九六年筆者在南京博物院見到一些江蘇句容城頭山咎廟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一件帶有極明顯的弧線切割痕的半圓形環，呈均勻的雞骨白；一件小小的錐形器，刻飾人頭，樣子有點像張陵山出土的人頭形觶形器；由玉器風格觀之，似乎接近良渚早期的風格。

一九八三年魏正瑾先生發表了兩件咎廟遺址出土的三孔石刀，一件器較寬，三孔等距，(圖二九)另一件，從形制上

【註四一】：同【註一一】；楊美莉〈中國古代墓葬的「玉兵」〉，《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三卷第四期頁九三～一七二。

【註四二】：同【註二四】。

【註四三】：魏正瑾〈寧鎮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點與分期〉，《考古》一九八三年第九期頁八二六。

看，似乎稱作「三孔石鉞」更貼切些，近刀背亦鑽出等距的三孔，寬幅大於長幅；（圖三〇）二件的外形，除寬窄之分外，皆為兩側斜弧而出，刃端外侈，凸弧刃，近似所謂「鳳」字形斧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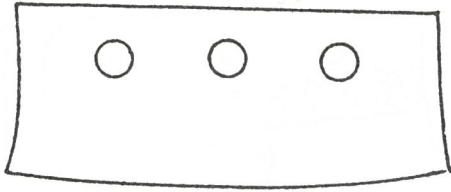
咎廟遺址除了採集上述二件三孔石刀外，另出有兩種類型的刀形器，皆帶柄，有嚴重的使用傷；圖三一、三二的石刀，推測是咎廟先民實際使用於生活中之物。而這種類型之刀形器，也普遍存在江、浙地區的良渚文化中。同屬於咎廟類型文化的南京西善橋太崗寺遺址，出土二件雙孔石刀，長約十二公分，一端作出弧形的柄，作為實際使用的帶柄刀形器；（圖三三）此遺址尚出土一些半月形石刀。

江蘇昆山趙陵山良渚文化早期遺址，出土一件雙孔石刀，（圖三四）長一六·四—一七·六、寬九·六一—一〇公分，刀背不甚平整，背緣中央有一半圓形缺，近背緣鑽有等距離的雙孔，製作精美，出土時與此墓所出的大石鉞同置於墓主下肢部位，推測其性質與大石鉞同，皆為玉兵性質之物。而真正作為實際工具的刀，應是如昆山綽墩遺址出土的三式石刀，其中二式帶柄，如圖三五、三六，一式不帶柄，三式皆作凸弧刃。【註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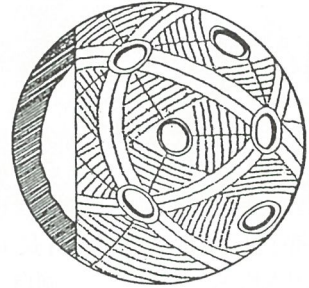
江蘇常熟嘉菱蕩良渚文化遺址，出土一件三孔石刀，（圖三七）黛青色頁岩，平背略斜，雙面平刃，近背端等距離鑽三個圓孔，皆為兩面對鑽，長二一·六一—二二·八、寬九·八一—一〇·四公分，形制與咎廟所出之三孔石刀略微不同，然亦屬玉兵性質之物。而常熟三條橋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件單孔石刀，灰色板岩，略呈扁平半月形，平背，單面圓弧刃，中央有一對鑽圓孔，長一〇·八、寬四·七、厚〇·三公分；（圖三八）另一件帶柄石刀，扁平長方形，一側斜出一柄，平刃，長八·二、寬四·一、厚〇·七公分，此件石刀即屬實際工具性質之物。由上述雙或三孔石刀與帶柄石刀同出，製作的粗細不同，方知咎廟類型文化與良渚文化先民，實際上是使用製作較簡陋的帶柄石刀作為生計的工具；而以製作較精緻的雙或三孔石刀作為象徵身分、地位的禮器。寺墩遺址亦出土一件，雙孔緊並一起的石刀，（圖三九）長一二·五、寬六·八、厚〇·五公分，雙孔的位置特殊，更說明此類玉兵，非屬實際功能者。

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晚期遺址，出土三件多孔石刀，其中一件為五孔石刀，（圖四〇）形制仍屬嘉菱蕩所出三孔石刀的

【註四四】：南京博物院、昆山縣文化館《江蘇昆山綽墩遺址的調查與發掘》《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二期頁九、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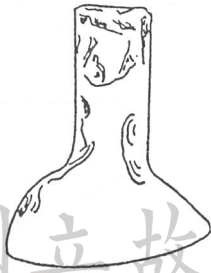
圖二九 三孔石刀 咎廟類型文化 江蘇咎廟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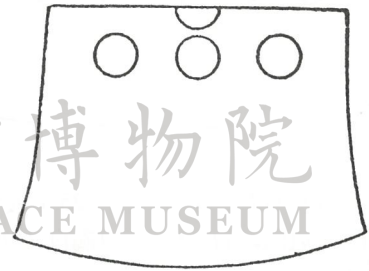
圖二八 鏤孔陶球 薛家崗文化三期 安徽潛山薛家崗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8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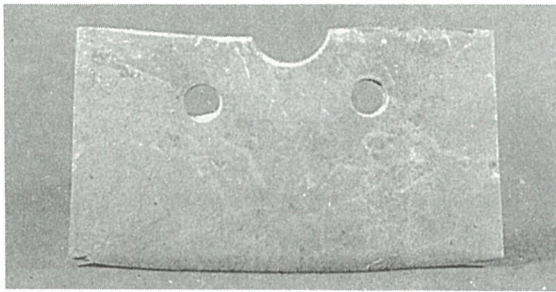
圖三二 帶柄石刀 咎廟類型文化 江蘇咎廟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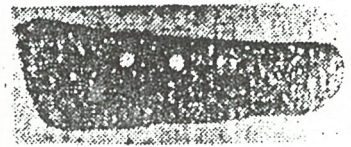
圖三一 帶柄石刀 咎廟類型文化 江蘇咎廟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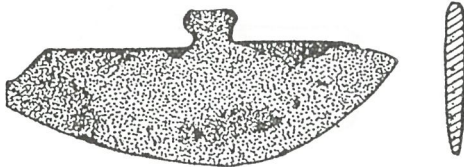
圖三〇 三孔石刀 咎廟類型文化 江蘇咎廟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83/9)



圖三四 雙孔石刀 良渚文化早期 長 17.6 公分 江蘇昆山趙陵山出土 (摘自《龍語藝術文物》NO.17)



圖三三 帶柄雙孔石刀 咎廟類型文化 南京西善橋太崗寺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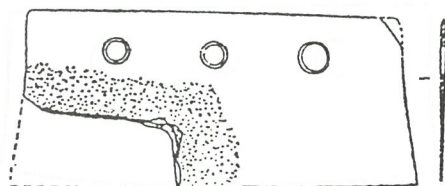
圖三六 帶柄石刀 良渚文化 江蘇昆山綽墩遺址出土 (摘自《文物》198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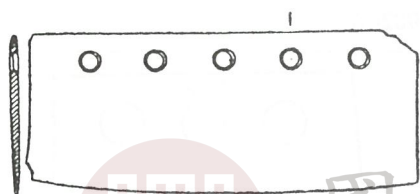
圖三五 帶柄石刀 良渚文化 江蘇昆山綽墩遺址出土 (摘自《文物》198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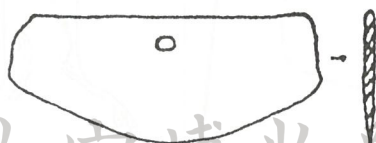
圖三九 雙孔石刀 良渚文化晚期 長 12.5 公分
江蘇常州寺墩遺址出土 (摘自《文物》
198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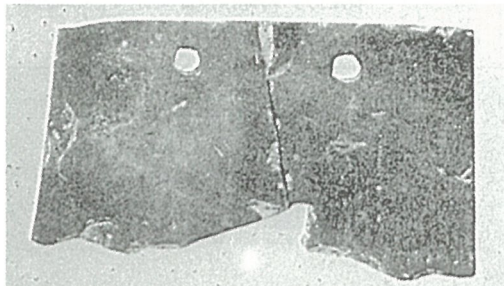
圖三七 三孔石刀 良渚文化 長 22.8 公分 江蘇
常熟嘉菱蕩遺址出土 (摘自《文物》
198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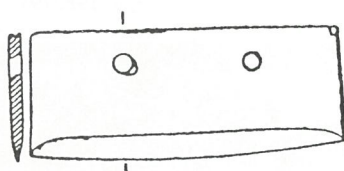
圖四〇 五孔石刀 良渚文化 長 25.4 公分 上
海青浦福泉山遺址出土 (摘自《文物》
1986/10)



圖三八 單孔石刀 良渚文化 長 10.8 公分 江蘇
常熟三條橋出土 (摘自《文物》198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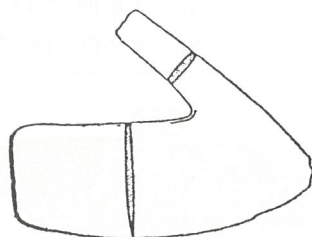
圖四二 雙孔石刀 良渚文化 長約 18 公分 杭
州老和山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58/2)



圖四一 雙孔石刀 良渚文化 長 20.6 公分 上海
青浦福泉山遺址出土 (摘自《文物》
1986/10)



圖四七 V 字形石刀 良渚文化 長 49 公分
餘杭石瀨鎮出土 (摘自《文物》1956/8)



圖四六 V 字形石刀 陶寺類型龍山文化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
1983/1)

傳統，（參見圖三七）而另外的二件雙孔石刀，（圖四一）刃長二〇·六、寬八·七公分左右，兩孔距離雖略遠些，長與寬的比例，以及全體風格接近杭州老和山出土之雙孔石刀的風格。（圖四二）

似乎在良渚文化之後，太湖地區出現一種橫長條、不對稱形的雙孔石刀，雙孔分置近刀背兩端，即二孔相距甚遠。這種形制的長刀，在吳縣光福太湖底採集到一件；（圖四三）在吳興錢山漾遺址也出土一件，（圖四四）錢山漾的此一石刀，發表的圖片極不清楚，似乎有斷傷，刀背鑽二孔？【註四五】上述二件石刀，均出於良渚文化的範圍內，因此一般將其訂為良渚文化之物；然依形制觀之，其長與寬的比例，似乎非屬長江下游區常見的比例；其形制的漸趨長條，以及兩孔分置於兩端等的製作意念，倒是令人想起山西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雙孔石刀。（圖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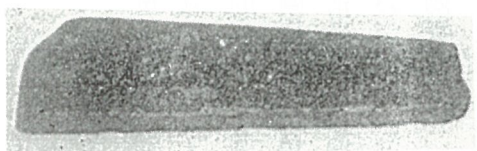
陶寺遺址於一九八〇年，在一座大墓中發掘出土多件石刀，其中有一件雙孔石刀，長二五公分，兩側成不對稱長條形，近刀背上的二孔相距甚遠，除刀背外，三面帶刃；如此多方向發展刃部，似乎暗示著一種強調殺傷力的意念之存在；而於此一大墓中同時出一種造型特殊的V字形石刀，（圖四六）此種石刀在黃河流域是罕見之物，然卻是長江下游區，自馬家浜文化以來，特有的、且較為普遍存在的生產工具，尤其在太湖地區、錢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遺址，普遍有出土例，例如餘杭石瀨鎮出土一件長四九公分的大型V字形石刀，（圖四七）吳縣光福鎮北虎山橋的北面也出土一件類似的V字形石刀。（圖四八）陶寺遺址所出的雙孔石刀以及不只一件的V字形石刀，與長江下游區所出者，竟有如此大的一致性，似乎暗示著，在二、三、二千紀交接之際，這兩個相距甚遠的文化，有過不平凡的接觸，其接觸的方式如何？正是耐人尋思的課題。

良渚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地消失？一直是考古學界不解的謎，而在其後此一地區的文化似乎一蹶不振；一般人的推測是，太湖水泛濫，淹沒了整個良渚文化區；【註四六】固然可怕的天災，將使其經濟受到嚴重的破壞；然似乎也不致於令整個文化傳統消失；加上廣東石峽文化於一九七三年發掘出土之遺物，與良渚文化晚期風格雷同，【註四七】全然是良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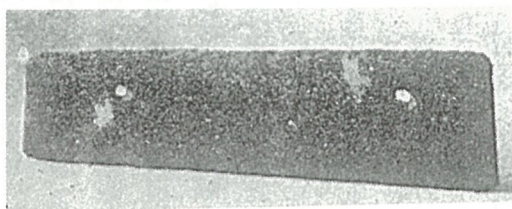
【註四五】：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吳興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六〇年第二期頁七三、九一。

【註四六】：尹煥章、張正祥《對江蘇太湖地區新石器文化的一些認識》《考古》一九六二年第三期頁一四七、一五七。

【註四七】：廣東省博物館、曲江縣文化局石峽發掘小組《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七期頁一、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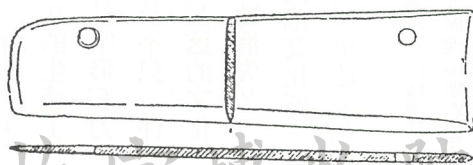
圖四四 雙孔石刀 良渚文化 吳興錢山漾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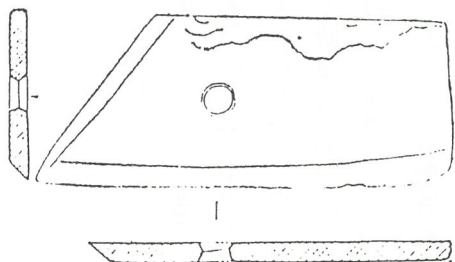
圖四三 雙孔石刀 良渚文化 吳縣光福太湖底出土 (摘自《考古》19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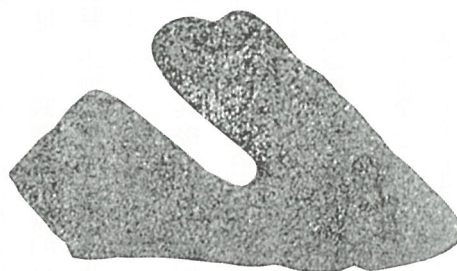
圖五〇 雙孔玉刀 二里頭文化 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86/4)



圖四五 雙孔石刀 陶寺類型龍山文化 長 25 公分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8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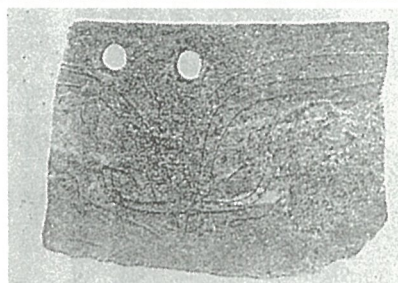
圖四九 雙孔石刀 陶寺類型龍山文化 山西垣曲龍王崖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86/2)



圖四八 V 字形石刀 良渚文化 吳縣光福鎮北虎山橋北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61/3)



圖五二 刻有花紋的陶片 二里頭文化 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65/5)



圖五一 刻有花紋的陶刀斷片 吳縣光福虎山遺址出土 (摘自《文物》1956/8)

化晚期的移植，推測在晚期曾有一支貴族被迫往南遷移，其遷移的路線也暗示著，乃因北邊來的壓力。今日我們有必要重新思索良渚文化消亡的主要原因，是不能不考慮由本文所引發的此一端倪，即是否與陶寺文化的接觸有關呢？

晉南的陶寺類型龍山文化，除了陶寺遺址出土有V字形石刀外，據報告者說，在曲沃方城遺址亦有類似器出土。【註四八】而在晉南垣曲龍王崖遺址，廟底溝二期文化層，（相當於龍山文化早期）亦出土有一件，可能是雙孔多刃側的石刀，（圖四九）此一石刀殘長九·八、寬四·一公分，兩側帶刃，若由僅剩的一孔觀之，應另有一孔與其對稱地，是在垂直的一邊，推測是斷傷掉了。

陶寺類型龍山文化是一般討論夏文化的焦點，不僅因其自古以來即有「夏墟」之稱，【註四九】更因其出土遺物也顯示出與二里頭文化有直接關係。【註五〇】偃師二里頭遺址於一九八六年也曾出土一件斷缺的雙孔石刀，（圖五〇）此一石刀以其殘器觀之，已是兩側帶刃，推測應是與陶寺所出之雙孔石刀一般，為三側帶刃的石刀，唯其雙孔均嵌上綠松石。

而在前面提及的吳縣光福虎山遺址，除了出土V字形石刀外，也出土一些刻畫有花紋的陶刀，一件陶刀斷片上刻畫雙身獸面紋，（圖五一）其紋與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片上所刻畫的，（圖五二）似為同一文化下的表現，推測兩地文化的確存在著一些共通性。

綜合上述的考古出土資料，再加上史書上記載禹會諸侯於塗山的地緣考證，似乎也可以輔證長江下游區文化與夏文化的關係。推測在陶寺極盛之時，其勢力曾及於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範圍，而在三千紀盛極一時的良渚文化竟由於此一勢力的侵入，而宣告滅亡，其中的一支貴族被迫遷移至廣東曲江流域，建立了所謂「石峽文化」。而此一地區在陶寺之後有二里頭文

【註四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一期頁一八～三一）。

【註四九】：徐旭生先生認為史書記載的「夏墟」應是在豫西，也就是後來發掘的偃師二里頭遺址（徐旭生〈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

《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一期頁五九二～六〇〇）；高煒先生則認為晉南的陶寺遺址，可能就是「夏墟」（高煒〈陶寺考古發現對探討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意義〉《中國原始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五六～六八）。

【註五〇】：同【註四九】高煒。

化的介入，若如一般學者所相信的，陶寺類型龍山文化是夏文化或先夏文化，二里頭文化是夏民所建立的夏王朝文化的話，則陶寺與二里頭實際上是同一個文化的先後。而若由兩個文化在長江下游區建立勢力之後，所表現的文化雷同性觀之，似乎也透露著兩文化間的一體性；如此史書上記載的，禹會諸侯於塗山的「塗山」，其地緣可能是浙江紹興了。

有關塗山地緣的考證有三說：(一)今之安徽懷遠縣東南、淮河東岸，又名當塗山，《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二)今之四川重慶市巴縣也，晉常璩《華陽國志》一：禹娶於塗山……今江州塗山是也；(三)今浙江紹興縣西北，《越絕書》八記地傳：塗山者，禹所娶妻之山也，去縣三十五里。【註五一】

上述的考古出土資料對於「禹會諸侯於塗山」的記載，提供了考證其地緣的可能線索；而黃河中、上游的文化早在仰韶文化時期，甚至於更早就經由江淮水系的帶動，與長江中、下游區的文化進行交流，初期的接觸，可能是緩慢而溫和的，但卻也經由這樣點點滴滴的互動、以及相互間的影響，促進了各地區文化的成長。

大約在良渚文化末期，黃河中、上游區快速膨脹的殺伐之氣，具體地體現在極度發展的大型玉兵上，而藉著這一股兵戎之氣，晉南的陶寺類型龍山文化先民，以強勢侵入良渚文化的領域，可能就在這一次的南下中，良渚文化的部族不能抵擋這一西北來的強大力量，而宣布滅亡，（當然，天災的因素也許也同時存在）從此以後太湖地區有一段相當長的沉寂，直至後來的馬橋文化仍不覆再有良渚時代的盛況。這也許印證了史書上所記載的，禹會諸侯於塗山的傳說屬實。

4. 小 結

綜上述，長江中、下游雖然在良渚文化結束之際，出現了一些不屬於其傳統的雙孔石刀，然可以見出，那是一種強加其上的外來力量使然；基本上江淮地區，自北陰陽營文化以來，所製作的多孔石刀，其形制受到此地區發展隆盛的斧形玉兵形制的影響，尤其自良渚文化起，普遍出現一種寬幅與長幅在比例上較接近的雙、三孔玉刀，其與西北地區的長條取向的玉刀不類。

【註五一】：諸橋轍次「塗山」條《大漢和辭典》卷三（東京：大修館書店，一九八四）頁二二八、二二九。

同樣地，薛家崗文化三期所出的奇數孔石刀，推測是薛家崗先民熱愛一種連續二方圖案下的產物，將這種來自於廟底溝類型文化的花葉紋變形成的花果紋，配合鑽鑿的孔，成就了一種既代表階級分化明細，又具掌握尺度萬物之功的多孔玉兵。

沓廟類型文化、良渚文化，所出之刀形器，依其形制、性質，基本上可分成二大類，一類是帶柄，製作較簡陋、粗糙的工具性質之石刀，此類器應不屬於本文主要探討的範圍，另一類即是本文主要討論的多孔石、玉刀；後者大抵都無使用痕跡，推測仍屬玉兵性質之物；其主要特色在其並列的一排多孔，孔間距離相等，但大多為上下的寬幅與左右的長幅比例較接近之器，（這比例是介於斧與刀之間的比例）如此，似乎也印證了筆者在此一部分一再強調的，長江下游區以及江淮水系區，是一個發展斧形器的地區，其他類型玉兵的製作，多少均受到斧形玉兵形制上的影響。

然在良渚文化結束之際，也即是黃河中、上游區開始發展多孔玉刀的同時。此地出土一些石、玉刀，在形制上、鑽孔上，均本質性地作了改變，此一種改變正如我們在前面詳細論述的，可能與西北來的勢力有關。

三、黃河中、上游的多孔石、玉刀

黃河中、上游自仰韶文化起，即以單孔或雙孔石刀作為主要的生產工具，此我們在前言的部分已經提過，而在廟底溝期，石刀的製作，隨著農業的進步，製作量大增，然基本上仍維持一種小型雙孔刀的形式，即長方形，長度在十公分左右，雙孔鑽於近背緣、中軸線上、刃線上緣的中央位置，刃部僅在一側，為單面或雙面刃。

降及龍山文化晚期，石刀的製作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一種長條形的多孔石、玉刀，極快速地在此一地區發展起來。此與整個黃河中、上游區，此時期的文化有密切關係，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有較詳細的論述。【註五二】而有關西北地區多孔隙石刀的發展，林已奈夫先生曾作過仔細的編年，（參見注九）林氏以石、玉刀之基型作為分類和編年的標準，將歷來出土與傳世之多孔隙石、玉刀分成：(1)不對稱粗短型；(2)不對稱細長型；(3)接近對稱細長型；(4)孔不對稱細長型；(5)接近長方型；

【註五二】：楊美莉〈中國古代墓葬的「玉兵」〉，《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卷第四期（一九九六）。

(6)其他；另外對被剖切成薄片的石、玉刀，以及一端刨成凹弧的多孔石、玉刀，均另闢篇幅討論。

林氏的精密分析與研究，已為現存世的多孔玉刀釐出一個發展的脈絡。然筆者深覺多孔石、玉刀的特色，不僅在其造型，更在其鑽孔位置的選擇以及孔排序上的意念；因此本節，將嘗試由這樣的角度，重新探索西北地區多孔玉刀的演變。這過程粗分為四個類型，即石峁型、延安型、刨窪型、上孫家寨型；每一期的名稱取自於代表作品出土之遺址，唯刨窪型之典型作品，大多為收藏於各大博物館之藏品，因此以其特徵稱之。

1. 石峁型的多孔玉刀

石峁遺址於一九七六年調查徵集的玉刀，據報導近四十件，然一半以上是長度十、寬度五公分左右的單孔、雙孔玉刀，大多選擇玉質較佳的墨玉、青玉為之。【註五三】單孔玉刀，孔的位置選在一端的中央，與一般仰韶文化作為生產工具的單孔石刀鑽孔的位置不同，其鑽孔屬斧形器性質，如玉鏟等器形者，推測此孔的性質和功能不同於黃河中、上游區作為主要生產工具的石刀之鑽孔；作為生產工具的石刀，其孔是為手握刀時穩住刀而鑽的，或為穿繫繩子，便於手按住繩子用的，或縛柄用的，如圖五三所示的姿態。但是石峁所出的單孔玉刀，其孔又不能如斧形器一般縛柄，因此，似乎是為了穿一繩繫於腰間或其他地方使用的；其與同時出土的玉鏟之區別，大概僅在刃部的方位了。器大多甚薄，厚度在○·二~○·四公分間，然這樣薄的石、玉刀，似乎也不宜作為實際的生計工具，而應屬玉兵性質之物。

而一種稍大型的玉刀，長度在二、三十公分間，近刀背處鑽有雙孔，兩孔相距較遠。（圖五四）由雙孔的位置，推測其與一般實用的雙孔石刀性質也不同，孔的功能似乎也非為手握或縛柄或固定皮革之類的功能者；【註五四】而是別具文化意義。長型雙孔石刀的例子，不僅見於石峁遺址，在山西陶寺遺址、江蘇吳縣光湖遺址也有出土例，（參見圖四五、四三）此

【註五三】：戴應新所製的統計表（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五期頁二四六~二四八）；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三）——多孔刀〉《故宮文物月刊》第一二卷第七期（一九九三）頁七八~八五。

【註五四】：林巳奈夫《中國文明的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頁一七一。

我們在本文的前半部第三小節已詳述過；唯後者之基形爲不對稱的長條形，而石峁所出者，其兩側幾近於對稱形。

石峁出土的玉刀中，長度在三十分分以上者，實際上並不多，大約五、六件之多；【註五五】三孔、四孔、五孔的均有之，仔細分析它的孔數，似乎沒有特別的意義，而除了近刀背處鑽一排並不一定等距的孔之外，大多數的多孔玉刀，均在較窄端的橫中軸線上鑽有一較大的孔，此孔暫稱作「端孔」，近似牙璋柄上之孔；此孔的鑽鑿比近刀背處的孔（背孔）來得穩健，推測端孔是此型玉刀上的主孔。因此，石峁遺址所出多孔玉刀上的鑽孔，依位置分爲端孔與背孔兩種，爲兩種性質不同之孔。

石峁多孔玉刀上的背孔表現較不穩定之處，除了其孔數不定之外，孔位置的選擇似乎也沒有固定，再加上造型稍嫌不穩定，例如兩側的稜線、背脊與刃線均帶有某種程度的猶豫性，種種的跡象似乎暗示著，石峁的一部分多孔玉刀仍屬開創期之作品。

石峁所出的多孔玉刀中，不少是由牙璋的基形改製來的，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戴應新先生在一九九三年發表的多孔玉刀中，提出其中的一件是由牙璋改製來的，（圖五五）【註五六】依筆者的推測，可能不只這一件；大凡多孔玉刀中帶有端孔，且端孔比背孔大，材質爲墨玉者，皆可能是直接或間接受牙璋製作影響的作品，當然其中也不乏是一些牙璋的廢品改製，或牙璋的未成品改製成的。此遺址之牙璋大多是選用一種光澤度很好的墨玉爲之，此一擇材的準則，可由大量的統計數字得到證實，【註五七】致於這種墨褐色光澤究竟對使用牙璋的先民而言，意味著什麼？不甚清楚，猜測或許與西北地區在龍山文化晚期製作殺傷力極強的銅兵器的色澤有關，選擇一種近似銅兵的色澤，希望所製之牙璋，也能在祭典或儀式上發揮與銅兵相同的威力。【註五八】

【註五五】：同【註五三】戴應新，一九八八，頁二四六、二四八的統計表。

【註五六】：同【註五三】戴應新，一九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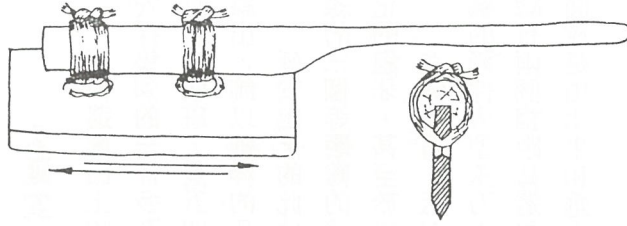
【註五七】：依石峁出土之牙璋，屬墨玉質者佔絕大部分，現藏於海外幾個大博物內之牙璋，亦以墨玉質爲多，例如沙克勒（Sackler Museum）、弗利爾（Freer Gallery）等博物館收藏之牙璋，墨玉質者佔大部分。

在一些摒除了端孔之後的長條形玉刀中，我們仍可發現沿著刀背緣的一排孔，其定位仍帶有相當的不肯定性。而這些鑽孔的意義為何？截至目前為止，石峁所出之多孔玉刀，孔數由三至五不等，似乎也沒有規律性可尋，孔間距離大致相等，然也出現不均等的例子。端孔可能與牙璋的柄孔有相似的功能。而端孔在多孔玉刀發展的過程中，有逐漸變小而消失的趨勢，背孔則曾一度在端孔變小時變大了，然後也逐漸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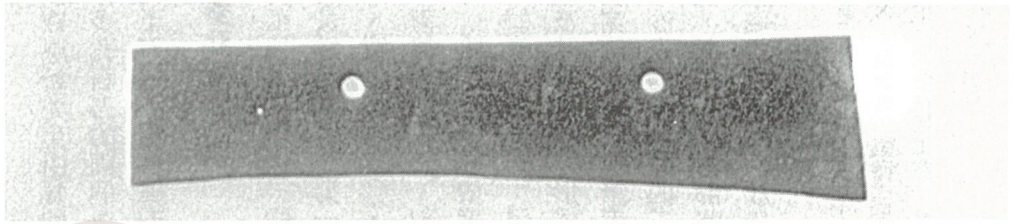
在前面我們極為重視的是，石峁的多孔玉刀可能有一部分是牙璋的廢品或未成品改製而成的；但若考慮到刀形器畢竟仍是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中、上游文化中重要的生計工具；且雙孔石刀的製作在此地區的龍山文化時期，尤其是陝甘地區，（包括客省莊二期和齊家文化）已達穩健成熟的階段，此期此類石刀，雖仍屬工具之類，然其外形整齊，刃線明確，落孔肯定；（圖五六）在如此的基礎下發展多孔玉刀，似乎並不是困難之事。因此，我們相信西北地區多孔玉刀的發展是有其優渥的條件的；但在成就其為大型禮器的過程中，有些形制設計上的細節，一些製作大型器的經驗則是與牙璋互相分享的；玉材的使用在初創期，常與牙璋共用，因此，在未成器之前，兩者是可以互用的。

此處筆者想再重申前言部分所提出的觀點，石峁多孔玉刀與牙璋在功能造型上，雖是完全不同的兩類器，牙璋的刃部在兩個短側邊的較長一側，刃為斜刃或凹弧刃，多孔玉刀的刃部則在兩個長邊的較長一側，呈平刃或微凹弧刃；然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兩者卻是同一時代相並出現的，在基形上皆屬於一種長條的大型器；推測在製作技術上、形制設計上，兩者有可能相互參考、影響；一個製作牙璋的玉匠，他可能將一些製作長條而大型器的經驗，與製作多孔玉刀的玉匠共同分享；或根本上，製作牙璋的玉匠也製作多孔玉刀，因此製作技術是一致的；無論是在那一種情況下，推測在製作此類純屬玉兵性質之物的時代，玉匠本身或支助者本身均在製作的過程中，發揮某種程度的影響力；因此，若言多孔玉刀在其形制塑成的過程中，有一些因素是受牙璋造型的啓發，有些細節上受牙璋的影響，那也不是不可能之事；況且，兩類器皆屬禮器性質之玉兵，其最主要的功能是一致的，即作為象徵性的儀式用器。反之，多孔玉刀或其他類的玉兵，如後起的戈形器等，也可能影響牙璋

【註五八】：據李權生先生在青海見過一件青銅矛，長六四公分，屬齊家文化之物，推測齊家文化有相當發達的銅兵製作（李權生〈客省莊文化的成立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二二五冊（一九九四）頁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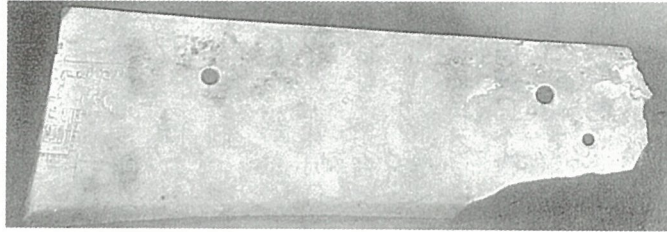
圖五三 雙孔石刀繫繩安柄復原圖(摘自李京華先生的復原繪圖) (摘自《農業考古》1991/1)



圖五四 雙孔玉刀 石峁類型龍山文化 長 31 公分 陝西神木石峁出土 (摘自《故宮文物月刊》卷 11 期 7)



圖五五 由牙璋改製來的四孔玉刀 石峁類型龍山文化 長 29.8 公分 陝西神木石峁出土 (摘自《故宮文物月刊》卷 11 期 7)




圖五八 三孔玉刀 龍山文化晚期 長 48 公分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摘自《中國古玉の研究》頁 442)

的製作。【註五九】

石峁遺址的年代，依戴應新先生由其同出之陶器的風格分析，屬於客省莊二期，其年代約三千紀末，即 2200~2000 B.C.，距江淮地區曾經製作多孔石刀的兩個重要文化——薛家崗文化三期、北陰陽營文化二期晚上一、二千年；因此，在時間的差距上，似乎石峁的多孔玉刀與江淮地區的多孔石刀沒有直接的關係，大體還是此一地區獨特的發展。

2. 延安型的多孔玉刀

石峁遺址出土的多孔玉刀，在經過一段較不穩定的摸索階段之後，形制漸趨穩定，端孔變小，（比背孔小）而在陝西延安採集到的一件多孔玉刀又爲此型器之另一代表。延安蘆山峁採集來的七孔玉刀，（圖五七）實際上是四孔玉刀，黃綠色間有粉白紋斑，長五四·六、寬一〇、厚〇·四公分，平背，背緣有三個殘孔，背孔三個一字排開，窄端有一端孔較小，兩側斜出，飾以細粹的牙飾，刃略呈凹弧刃，刃線漸趨明朗，無使用痕跡。【註六〇】

延安出土的此件玉刀，除了在端孔與背孔大小的消長上與石峁所出者不同之外，其另有二項特色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背緣的三個等距離的殘孔；（二）是兩側的牙；這些牙的組合形式，似乎看不出有規律性的組合，不像典型的龍山文化或二里頭文化的鉏牙，甚至於二里崗及其後的鉏牙形式；右側較完整，成「

在多孔石、玉刀兩側刻飾牙組，據筆者所知，尚有沙克勒博物館（Sacker Museum）、弗利爾（Freer Gallery）美術館收藏的兩件大型玉刀；現藏沙克勒博物館的三孔玉刀，（圖五八）長四八公分，兩側呈不對稱形，窄端有一較小的端孔，沿背緣有兩個相距甚遠的背孔，背平直，刃部略呈凹弧，刃線清楚，寬端的側緣上有細淺的牙組，牙間的器面上陰刻面紋，此一面紋是由水平和垂直線構成的，整體花紋極富幾何形式，然其基形是屬於龍山文化晚期常見的，以卷曲線條構成的面紋，推

【註五九】：可以參考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之牙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九第五期頁一、二〇；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七第十期頁一、一五）。

【註六〇】：姬乃軍〈延安市發現的古代玉器〉《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二期頁八六。

測此一幾何式面紋是卷曲者形式化之後的產物；因此，此刀的面紋和側緣的牙組若與刀成器的時間一致的話，則此三孔玉刀的製作時代，似是龍山文化晚期之末，即龍山文化典型的面紋已趨形式化之際，但又不晚及二里頭文化三期。

沙克勒的此件三孔玉刀，與延安所出的七孔玉刀比較，有四點共通，即(一)全器皆屬兩側不對稱形；(二)皆有背孔和端孔，且端孔比背孔小；(三)側緣均有牙組，且牙的形式近似；(四)刃部均為略凹弧刃。但兩者間也存在著不同點，例如(一)沙克勒的玉刀背孔僅二個，且相距甚遠，而延安的玉刀背孔三個，並在背緣尚有三個殘孔；(二)沙克勒玉刀除了有側牙之外，在牙間的器面上尚陰刻有幾何性面紋，牙與紋飾之間似乎是一體的表现；那麼延安的，僅有牙無面紋，是否是後來磨掉了呢？或是未完成作品？推測是前者的可能性較大；其理由之一乃是其背緣有三個殘孔，顯然此器曾被整治過。總之，沙克勒者與延安者，可以是同時期之製作，然延安者似乎保存較多西北本土的石、玉刀之本色；沙克勒者，則接受較多東邊龍山文化的一些因素，例如東邊龍山文化中常見的面紋主題，但在花紋的表現上，卻又以西北地區傳統的直線作為基礎，而不取東邊的卷曲線條，這種以水平、垂直線表現圖像的方式，直覺地讓人連想到春秋戰國時代興起於隴西地區的秦國之花紋風格，(圖五九)或許此一玉刀上的花紋，即為後來秦地風格花紋的前身。

另一件現藏於弗利爾美術館的玉刀，亦為兩側不對稱形，刀背筆直，沿著背緣鑽有三個等距離的孔，無端孔，兩側斜出，有細碎的牙組，刃部清楚，刃線明確，然在較窄端的刃部似乎曾經改刀刻以另一組牙飾，全器一面上可見到三組花紋，兩組是虎與人首紋，一組是側面人面紋(圖六〇)此一玉刀若依其形制以及孔的鑽作觀之，並不屬於延安類型之多孔玉刀，而屬於後面即將討論的，上孫家寨類型的玉刀，唯其兩側的牙組以及器面上的花紋，均值得探討，故在此先作論述。

弗利爾的此件三孔玉刀，窄端側緣上的牙，仔細觀察，與龍山文化以來，在牙璋或斧形玉兵，甚至於其他類型器的外緣所刻的所謂「鉏牙」性質不同。它實際上是窄端器面上所刻飾之人側面像的輪廓，隨著人面的冠、額頭、鼻、雙唇、下頷的輪廓，凹凸起伏出現在器側緣；因此若認真命名，不應該稱作「牙飾」的。

另一邊較寬，寬側緣的牙，稍帶規律性，然也略嫌雜亂，推測是因應其旁的虎與人首紋而起的牙飾，其意乃是表示虎身所散發出來的神性之氣，【註六一】正好與虎身背側外所加飾的，類似銅器上的扉稜之物一致，均是當時人表現一種神性之

物的方式。虎與人一起表現的主題，流行於商代的南方地區，推測將此一花紋刻飾於玉器上，是受銅器鑄作的影響；如此，弗利爾所藏的此一件形制、花紋複雜的三孔玉刀，器面上虎紋的琢刻應是晚於人側面紋的琢刻，（即B晚於A）人側面紋屬龍山晚期之末的風格，推測與作器的時間同時，【註六二】寬邊上的虎紋與人首則可能晚至商代，而另一組虎與人首紋（C）被刻於刀側的一端，並將此處的刃部改刀作成牙組，此一組花紋完全仿自寬邊的虎與人首紋，然刻工顯不如前者，推測是更晚近之作。關於此一件玉刀上的諸多問題，實耐人反覆思索，尤其是這三組花紋的研究性極高，筆者希望將來另闢一專文仔細討論。

若就延安的七孔玉刀之鑽孔觀之，背孔均比端孔來得大而明確，因此，此刀之主孔似非端孔，而是背孔；其兩側帶牙，若參考上述二件海外玉刀，似乎延安的七孔玉刀應是有花紋的，今不見有花紋的報導，再見其背緣的殘孔，是否說明此一件玉刀在製作之後，曾被改建，先前作成的背孔一度被毀棄成半孔，或有特殊用意地作成半孔，而又在其下鑽出三個等距離的背孔，牙間的花紋也被磨掉了，成爲如今的形制？但縱使是被改治過，其時間與成器的時間也不會相差太遠，因兩排孔的鑽鑿方式是一致的。正式在多孔玉刀兩側緣加刻牙飾的是二里頭文化三、四期的例子，此留待後面敘述。

【註六一】：林巴奈夫先生認爲青銅器腹上裝飾的扉稜，即是表示溶於青銅容器內的神之氣散放出來的氣之表現形式；而此虎周身的類似鉏牙之裝飾，也如扉稜或是龍山文化以來在玉器上所裝飾的牙飾一般，表示一種具神性之物放出神性之氣的意思（林巴奈夫〈中國古代的遺物に表はされた「氣」の圖像の表現〉《中國古玉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頁二六九—三五八。

【註六二】：人首與虎一起出現的主題，似乎與人和虎作直接接觸的題材有關，據目前的考古發掘資料，較早出現人與虎關係的母題的時期，是在商代的青銅器上，且據Jessica Rawson，認爲虎作爲裝飾母題的地區是南方，江西新淦出土的虎形扁足青銅鼎，以及在一些青銅器的耳上附虎形立雕等，均是很好的說明；安徽地區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也有以虎和人身作接觸的母題者（石志廉〈談談龍虎尊的幾個問題〉《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一期頁六四—六六；Jessica Rawso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esigns in jade and bronz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 [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991, pp. 73-105）。因此推測表現在玉器上的，此一虎與側面人首的題材大約是圍繞商代不遠；雖然有關此一裝飾母題的討論，最近林巴奈夫認爲是二里頭文化的產物（林巴奈夫〈關於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玉器〉徐朝龍中譯《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三期（一九九六）頁一—四）。但筆者仍認爲此一玉刀上的虎與人首紋，仍是商人接受南方文化因素之後所加刻上的。

延安型多孔玉刀的特色，尚在其(一)端孔仍存在，但端孔比背孔小或大小相差無幾；(二)兩側的稍稍不對稱；(三)刃側微凹弧等；本院藏一件三孔玉刀，(圖六一)長三四·八、最寬九·一五、厚〇·四七公分，玉質屬於黃河中、上游玉兵常用的玉材，平背，兩側不對稱，窄端中軸上有一端孔，沿著背緣有二背孔，端孔與背孔一樣大，鑲作風格一致，刃為微凹弧刃，是接近延安型之玉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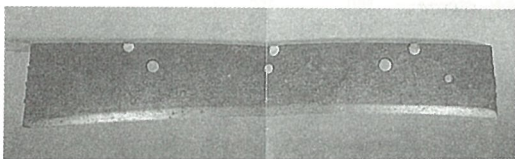
另外，在石峁遺址出土之多孔玉刀中，也有端孔小於背孔的雙孔玉刀，圖六二的雙孔玉刀，背略斜，兩側不對稱，窄端中軸上有一端孔，近於背緣中央有一背孔較大，刃為凹弧刃，肉色泛褐，玉質，長二·三、最寬九·三、厚〇·二公分，此一玉刀似為殘斷之器，然其基型近於延安型；本院藏一件雙孔玉刀之形制風格與前者極近似，(圖六三)玉質斑斕，表面有淺色蚯蚓走泥紋，長一七·五、最寬八·二二、厚〇·四五公分，平背，兩側不對稱，窄端平整而鑲有一端孔，近背緣中央有一背孔，背孔比端孔大，寬端上下為渾圓角而帶刃，刃為微凹弧刃緣，全器落孔明確而篤定，是此期較成熟之作。

本院藏另一件雙孔玉刀，(圖六四)大體形制與前者近似，亦為兩側帶刃緣，即長邊與寬邊均為刃緣，唯此器兩側接近對稱，端孔與背孔大小一致，分置中軸線的兩端，長二〇、最寬七·一五、厚〇·四七公分。此器與山西陶寺遺址所出之雙孔玉刀之風格有幾分近似，(參見圖四五)陶寺此一雙孔玉刀，我們在前面討論太湖地區良渚文化晚期出土之雙孔玉刀時，已經提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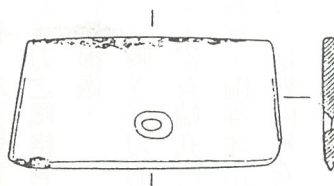
陶寺玉刀的製作，整體看來雖仍不出此一地區多孔玉刀的範疇，然其製作似乎非屬石峁多孔玉刀發展的模式，是在一種完全沒有端孔意念下之產物。今若由陶寺類型文化在中、晚期才大量使用玉器隨葬觀之，大約在三千紀末期(2000 B. C.左右)，陶寺才出現此種兩側帶刃的雙孔玉刀，且其兩孔分置兩端近背緣；因此，有兩個可能值得推敲，(一)是陶寺的雙孔玉刀，是經由延安型發展來的；(二)是，由當地傳統的生計工具——石刀發展來的。筆者覺得前一種的可能性較大。

3. 刨窪型的多孔玉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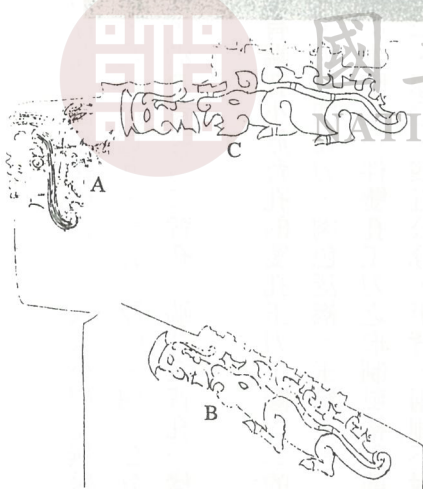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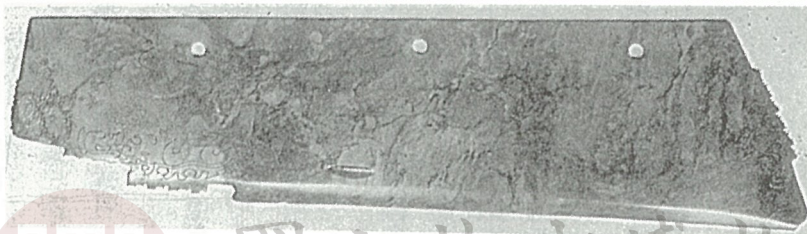
在歷代出土或傳世的玉器中，被附加上最多各種不同文化意義的痕跡之玉器類，大概就數西北地區製作的多孔玉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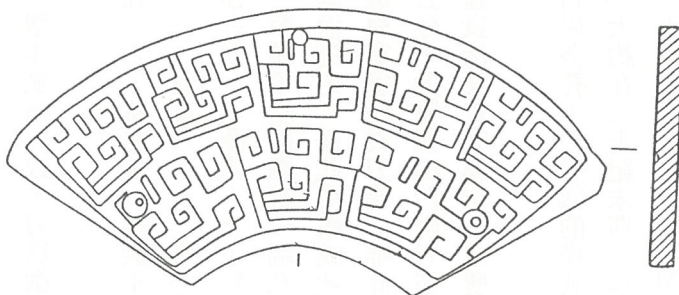
圖五七 七孔玉刀 龍山文化晚期 長 54.6 公分
陝西延安蘆山峁出土 (摘自《中國文物精華 1992》圖版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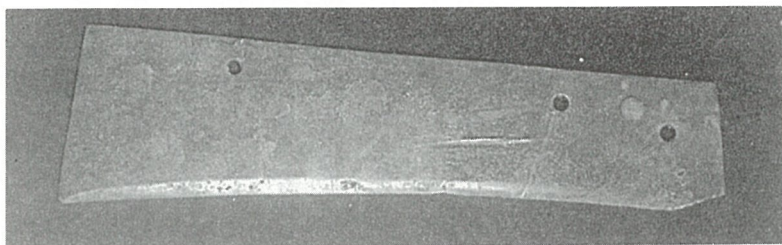
圖五六 單孔石刀 客省莊二期 長約 11 公分 陝西禮西客省莊遺址出土 (摘自《禮西發掘報告》頁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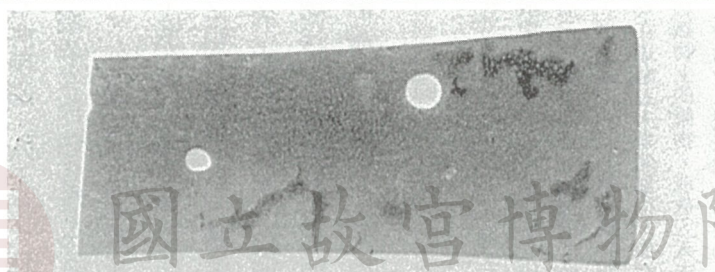
圖六〇 三孔玉刀 龍山文化晚期 長 71.8 公分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摘自《中國古玉の研究》頁 4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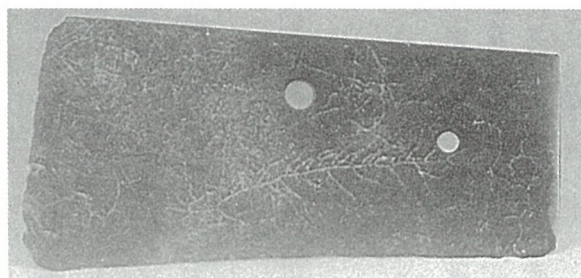
圖五九 帶有秦地風格之花紋的玉璜 陝西鳳翔秦都雍城出土 (摘自《文博玉器研究專刊》頁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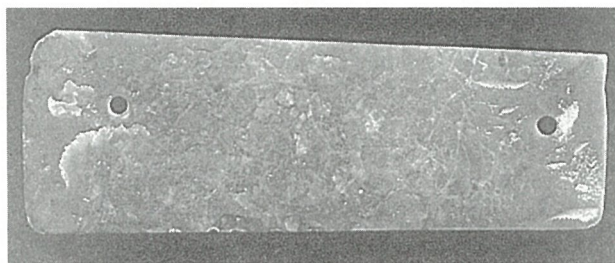
圖六一 三孔玉刀 龍山文化 長 34.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圖版 88)



圖六二 雙孔玉刀 石峁類型龍山文化 長 21.3 公分 陝西神木石峁出土 (摘自《故宮文物月刊》卷 11 期 7)



圖六三 雙孔玉刀 龍山文化 長 17.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圖版 90)



圖六四 雙孔玉刀 龍山文化 長 20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圖版 89)

例如加孔、切薄、加牙飾、加花紋、一端加刨窪等，這些極富於文化意義的痕跡，使多孔玉刀更耐人尋思。

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對玉刀，（圖六五）長四九·六公分，除了兩側無牙飾，柄孔的一端的背側上刨窪之外，其基本形制與延安所出之七孔玉刀近似，唯其刀線甚為明確。

刨窪的問題，曾在學者間有些爭議，八十年代林巴奈夫先生在看過弗利爾美術館的此類玉刀之後，認為刨窪的時代應是與製器同時完成的，【註六二】羅森女史（Jessica Rawson）則持不同的意見，認為是後來加工的。【註六四】事隔多年，林氏則對自己當年的想法有一些修正，推測是與二里頭文化興起的柄形器之製作有關。【註六五】

柄形器的功能以及其文化上的定位，至今仍不甚明白，然自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柄形器以來，柄形器成爲商代很重要的墓葬禮器，若依其在二里崗層之墓葬遺址，以及其後的殷墟墓葬遺址出土的情況觀之，是隨葬玉器中極爲重要的禮器之一；

【註六六】然多年來學者們對它的了解極其有限；以西周出土的柄形器，和一些形狀不一的玉片一處放置爲例證，（圖六六）探討其功能的學者有之，大體認爲是一種裝飾玉。【註六七】

殷墟婦好墓出土一件玉柄形器，（圖六七）外形看似將一柄形器貫穿入一獸面玉飾的中央孔，獸面的下端尙露出柄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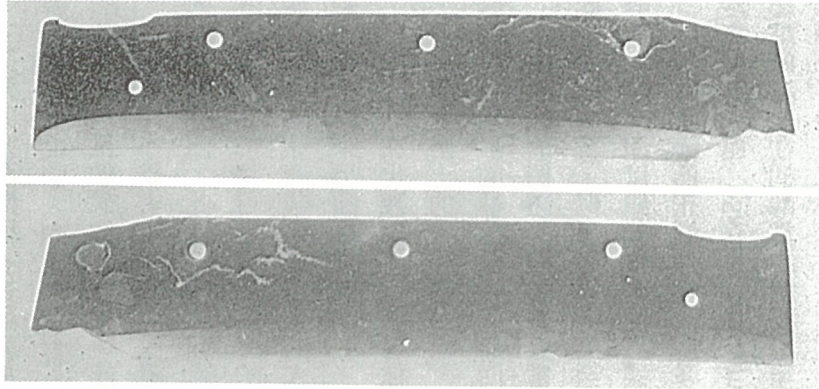
【註六三】：同【註九】頁四三六。

【註六四】：Jessica Rawson（見於林巴奈夫論文【註九】頁五〇九，一九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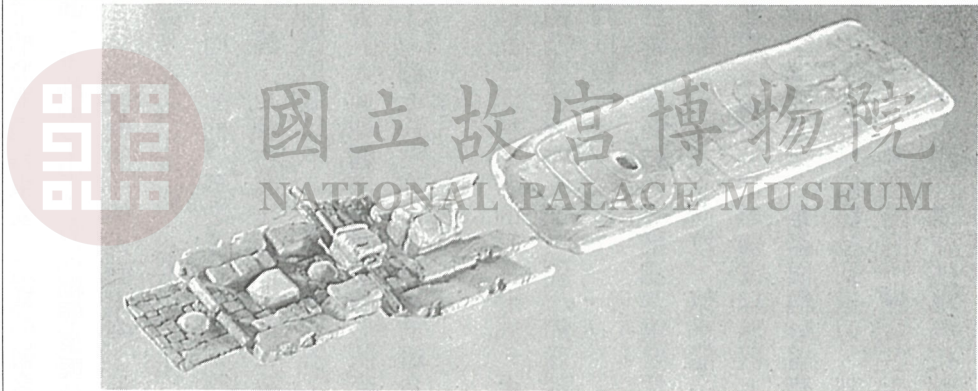
【註六五】：筆者於一九九五年完成中譯林氏的《中國古玉の研究》一書時，曾再度請教林氏對此一問題的看法；因筆者基本上仍認爲刨窪的時間應是在成器之後，林氏此時亦表示，最近對此一問題的看法略有改變，推測刨窪的意念，可能與二里頭文化期的柄形器之形制有關。

【註六六】：不少二里崗上層遺址，例如鄭州北二七路、銘功路等墓葬遺址，其隨葬的玉器並不多，玉質者更少，然大多數的大型墓，幾乎都有玉質的柄形器，且其出土位置，均在最貼近入身的部位，即左右手臂下，或其他貼身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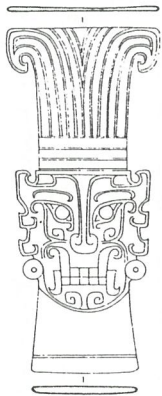
【註六七】：林巴奈夫亦懷疑是否爲織物上的飾物，或放入大圭的袋子外面的飾物？（林巴奈夫《中國古代的祭玉、瑞玉》《中國古玉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頁二六）；張長壽《西周的玉柄形器——一九八三—八六年濰西發掘資料之九》《考古》一九九四年第六期頁五五一—五五五。然林氏最近發表的一篇有關玉柄形器的論文，則有突破性的看法（林巴奈夫《大圭について（上）》《泉屋博古館紀要》第十二卷頁一五六）。



圖六五 一端刨窪的四孔玉刀 長 49.6 公分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摘自《中國古玉の研究》頁 477)



圖六六 玉柄形器組片 陝西寶雞漁國墓地茹家莊 1 號墓出土 (摘自《中國文物精華 1993》圖版 52)



圖七一 人面玉飾 商代江西新淦大洋洲商代遺址出土 (摘自《文物》1991/10)



圖七〇 人面玉飾 龍山文化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摘自《美術研究》1979/1)



圖六七 玉柄形器 殷墟婦好墓出土 (摘自《殷墟玉器》圖版 115 左)

的一端，此器實是一玉雕琢而成；此件玉柄形器極為重要，這樣的組合形式，尚不知有何意義。但卻引發筆者一個重要的發現；在不少傳為龍山文化的人面（或神面）玉飾例子中，若仔細觀察與分析，則將發現這種人面與柄形器組合的例子並不少。

美國史密斯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ion）收藏的一件人面玉飾，（圖六八）高七·七公分，正、背面刻不同的人面，人像頭戴羽狀高冠，頸部下端有一突出如座，此突出近似一般見到的柄形器柄頭的部分；今我們若將此一人面玉飾之人面除去，加上些微的想像，畫出可能貫穿在人面內的柄形器之形狀，即如圖六八A所示。

另一件亦為史密斯機構收藏的人面玉飾，（圖六九）長七·四公分，人面以下很明顯地即為一柄形器，正、背面刻畫的人面花紋不同，此器若將人面除去，則自頭頂冠以下，亦為一柄形器；（圖六九A）現藏於沙克勒博物館的一件人面玉飾，（圖七〇）仍然可以看出這樣的組合，去其人面則露出柄形器的形狀來。（圖七〇A）若仔細蒐集類似的例子，似乎尚有幾個；江西新淦商代遺址出土的人面玉飾，（圖七一）亦是作這樣的組合的。柄形器的研究非為本文的主題，這兒就不一一介紹，留待將來另闢專文討論。

然龍山文化晚期流行的這種人面（神面）與柄形器的組合形式，至二里頭文化期，則轉為以更直接的方式組合；在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一件柄形器，以精緻的凸弦紋分作五節，隔一節琢刻上人面（神面）紋，此一傳統一直延續至商代，更發展出四方柱形的柄形器，每節四個角落刻以蟬紋者。

由上述的例證，柄形器與當時人視為神之神面結合，推測其重要性當不亞於神面了，是與神一體之禮器；在玉器上作如此表現的傳統，似乎可以上溯至良渚文化的玉琮上刻飾面紋，似乎龍山文化的先民，在表現與良渚文化先民相同的崇拜、禮神觀念時，即以此相同的方式表現，即想成神附於柄形器或琮形器上，來至人間接受人們的祈願。

言歸本節的正題，在一些多孔玉刀的一端加創窪，是否與柄形器有任何的關係呢？與弗利爾之創窪玉刀類似的作品，在沙克勒博物館（Sackler Museum）尚有兩件；而此類創窪多孔玉刀，其創窪通常都是有起有收，即若將靠內側，垂落作下作起點的話，在柄端常在凹弧之後，向上弧起作出一個凸出的小饅頭形作為收尾；（圖七二）這是完整的創窪形狀；且其選擇創窪的一端，常是有端孔的一端，推測其創窪之原意，或許是將多孔玉刀上的端孔視同柄孔，（如牙璋之柄孔）因此其創窪

之處，或許即視同柄部，但事實上在背側一端創窪，其相對的一側，仍然是刃部，實也構不上柄的實際功能；因此，我們的推測是，此一創窪若真為柄的話，也僅是一種象徵性的柄。

然這種象徵柄的表現方式，（即作成創窪狀）推測是來自於二里頭柄形器的概念；柄形器的名稱曾有不少學者反對使用，更有稱之為「琴撥」的，【註六八】然長久以來仍以柄形器稱之者較多，因為至今學術界仍不太確定其真正使用的場合與方法，因此，為避免造成名稱上的混淆，還是暫時以「柄形器」呼之。然也因此造成許多望文生義者的誤解；這也正是筆者在前言部分提出的觀點，考古工作者在對一件出土遺物命名時，是要作最周全的準備的。

另有一種情況的創窪是沒有凸起小饅頭形收尾的。本院現藏的一件三孔玉刀；（圖七三）暗灰綠色，長五七·四公分，較接近梯形，四邊稜線俐落，刃線亦明確，背孔三個，等距離鑽出，沒有柄孔，在較窄端背緣上作出創窪，創窪無收尾，若依此端側緣的切割線觀之，似乎也非殘損加以修整的，應是創作當時即已作如此之形了。再依其鑽孔觀之，本院藏的此三孔玉刀，似乎較上述幾件海外玉刀的製作年代略晚。

4. 上孫家寨型的多孔玉刀

青海上孫家寨出土的一件，屬於齊家文化的四孔玉刀，（圖七四）長五十四公分，青白色玉質，局部有褐斑，平背，平斜刃，雙面刃，背孔四個，其基形雖仍屬兩側不對稱形，然比起石峁以及延安者，已屬較對稱、穩定、成熟的造型，無端孔。其出土地點可以說是目前出土有多孔石、玉刀的遺址中，位置最西邊的一個遺址。而多孔石、玉刀的製作，在西北地區的範圍究竟分布多廣？目前所知的，東至陝西與山西交界的黃河邊，南可能及於豫南，西邊可能至齊家文化的西界，北至陝北或可能至內蒙中西部的朱開溝文化範圍。【註六九】

【註六八】：高去尋、石璋如所編著的殷墟發掘報告書上，均使用「琴撥」一詞（高去尋、石璋如《小屯》第一本·殷墟墓葬之五（上））。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八〇。

【註六九】：就目前考古發掘資料顯示，似乎在陝晉間的黃河是一個天然的界限，黃河東邊沒見過這類器的發掘，山東零星出了幾件，其風格似乎是長江下游區良渚文化的遺緒。

而與上孫家寨之四孔玉刀風格接近的多孔石、玉刀，大多是時代較晚，接近二里頭文化者；然石峁遺址出土一件五孔玉刀，（圖七五）其整體風格近似上孫家寨者。青海上孫家寨的此件四孔玉刀，較為完整地呈現多孔玉刀成熟期的穩定風格，沒有被附加上其他文化或後代的文化意義，此乃因其地偏西，較不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波及，故能保存較純樸的多孔玉刀之本色。然此器若比較石峁所出之成長性極強的多孔玉刀，則其穩健、落實，應屬齊家文化中晚期之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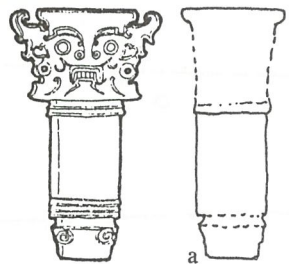
在沒有端孔的多孔玉刀中，尚有一較特殊類型的多孔玉刀，即背孔作扁長方形孔者。石峁遺址於一九七六年徵集了一件，背孔為扁長方形的三孔玉刀，（圖七六）此器殘長二六公分，墨玉質，甚薄，兩端成不對稱形，窄端殘缺，因此有背孔不甚清楚，然由一些同型器推測，應是無端孔的，定位鑽鑿三個背孔，其造形的穩定性，似乎與同出的一些多孔玉刀之風格不類。

一九九五年曾在大英博物館展出的一件雙孔玉刀，為 Sir Joseph Hotung 的收藏，（圖七七）長二六·三、寬六·二公分，暗灰綠色，有褐、綠紋斑，基形接近石峁遺址所出之方孔者，為兩端不對稱形，無端孔，背孔二個，呈扁長方形，分置較遠，微凹弧刃，刃線頗為明確；兩側不對稱，似乎比上孫家寨者略早。

美國紐約自然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四孔玉刀，（圖七八）殘長二四·五公分，三個背孔是扁方形的，一個端孔屬單面鑽圓孔，另外在柄端尚有一孔痕跡，全器呈窄長方形，刃線尚稱明確。此器之扁長方形孔，其鑽鑿的方式亦為先打兩個並列的小圓孔，再由兩小圓孔，相向磋磨穿通，即成孔邊不齊的扁長方形孔。此器若由其基形觀之，是上述幾件方孔玉刀中，較早的作品；乃因其端孔仍存在，推測其製作的年代接近延安型。

弗利爾美術館收藏一件三個扁方孔的玉刀，（圖七九）長二八公分，基形較接近二里頭文化期之刀形，屬於寬長形，與上述的窄長形略作區別；在離背緣稍遠的地方，等距離並列三個扁方形孔，方孔的鑽鑿方式亦採取先打二小圓孔，再貫穿二小孔的方式。此器在整體造型上比上述幾件方孔玉刀板硬些，似為較晚的製作。

這種鑽孔的方式以及別具一格的孔形，令人想起良渚文化中后期，反山、瑤山遺址所出的倒梯形冠狀器中央頂尖正下方的扁方形孔；（圖八〇）這種孔，林巳奈夫先生認為是「泉」之圖案化，是象徵太陽光穿過縫隙洩漏出的光，【註七〇】有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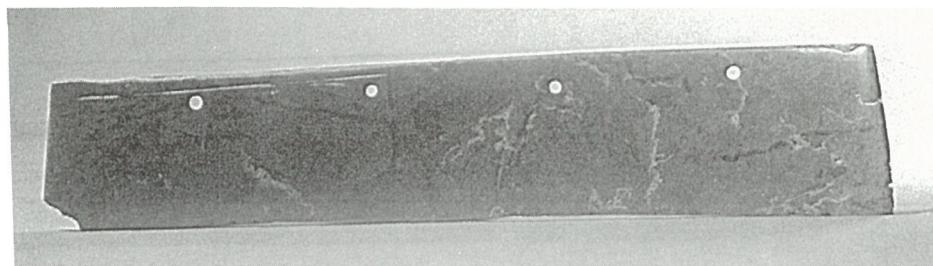
圖六九 人面玉飾 龍山文化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Collection (摘自《美術研究》197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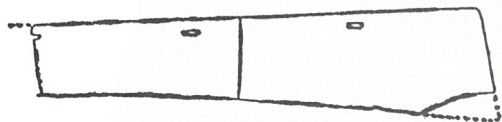
圖六八 人面玉飾 龍山文化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Collection (摘自《美術研究》1979/1)



圖七三 三孔玉刀 長 57.4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故宮文物月刊》卷 11 期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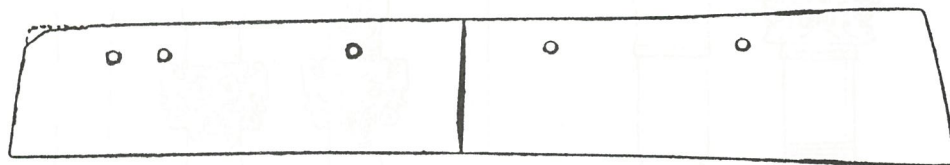
圖七四 四孔玉刀 齊家文化 長 54 公分 青海上孫家寨出土 (摘自《青海文物》圖版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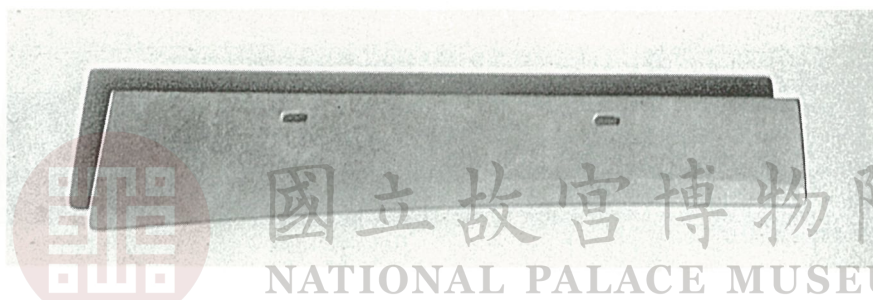
圖七六 三孔玉刀 石峁類型龍山文化 殘長 26 公分 陝西神木石峁出土 (摘自《考古》19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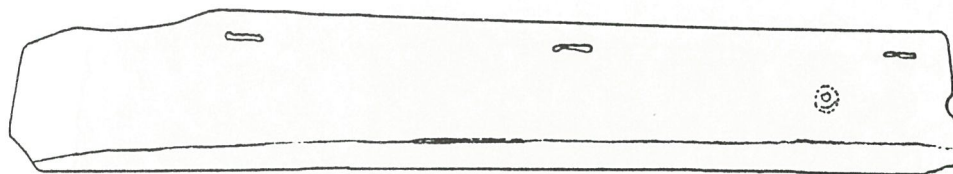
圖七二 刨窪弧的結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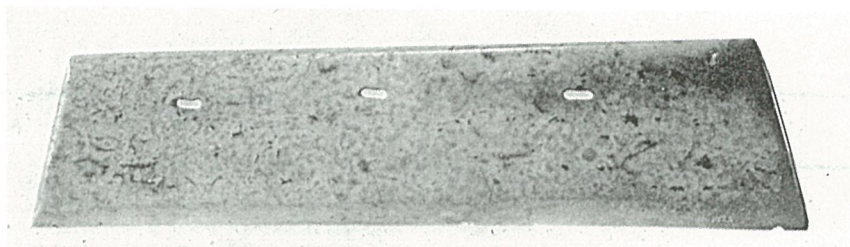
圖七五 五孔玉刀 石峁類型龍山文化 長 54.6 公分 陝西神木石峁出土 (摘自《故宮文物月刊》卷 11 期 7)



圖七七 雙孔玉刀 龍山文化 長 26.3 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摘自 Chinese Jade p.187)



圖七八 四孔玉刀 龍山文化 殘長 24.5 公分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Dept. of Anthropology, Drummond Collection (筆者草圖)



圖七九 三孔玉刀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摘自《中國古玉の研究》頁 436 後的圖版 3)

種良渚人對神秘光線的追求意念；【註七一】然良渚文化的先民製作此類孔的方式，似乎與西北者有些不同，在一件冠狀器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先在頂尖正下方鑽一小圓孔，再由此一圓孔向兩側磨蝕，即成如此的扁方形孔。

畢竟現存的扁方形孔的石、玉刀並不多，其製作的原初意念為何？實也很難作推測，是否與良渚文化先民對神秘光線的追求有關？而此一扁方形孔的製作意念，是否受到良渚文化倒梯形器上的扁方形孔的影響？我們曾經在前半部論述良渚文化遺址出土之雙孔石刀時，反覆地引證，推測良渚文化在晚期之末，受到西北來的陶寺類型龍山文化的侵略，導致滅亡消失，之後又受二里頭文化的牽制，因此而有「禹會諸侯於塗山的傳說」。那麼這些扁方孔玉刀是否也是這一次南北文化接觸後的產物呢？若由扁方孔玉刀出現的時間觀之，是在西北地區多孔玉刀發展的中晚期，相當於良渚文化結束之後不久，因此似乎也有可能性的。

5. 西北地區多孔石、玉刀的剖切問題

目前存世的多孔玉刀以及牙璋，常見有剖切成二或三薄片的現象，此一現象多年以來，並沒有多少學者認真地去研究他。林巴奈夫先生認為其剖切薄的行為，非為作器當時所為，然也非近代發掘之後所為；【註七二】而羅森女史（Jessica Rawson）認為玉器上切薄的行為，有三個可能的理由，即（一）顯示其切割琢玉的技術；（二）經濟上的考慮，即為了節省玉材；（三）藝術上的品味，一種薄透的審美觀的流行；【註七三】據目前出土之多孔石、玉刀觀之，剖切成薄片的現象以石峁所出之玉刀、牙璋為主要對象，其次是陶寺遺址所出之扁方形玉兵也有一部分出現切薄的現象，另外就是山東地區龍山文化時期，有一些玉板狀器或玉斧也出現切成薄片的。這些被剖切成薄片的玉、石器，以刀形器、璋形器、斧形器為多，且大多數被剖切者，其器面常呈一面略弧鼓且拋光細膩光澤，另一面則平板而略粗毛，並留有一道直線性的切割痕，有的略加拋光，顯出一些光澤，然大多數的此類器，其切面上的切痕均被保留下來。

【註七〇】：同【註六一】頁三〇一。

【註七一】：牟永抗、吳汝祚〈水稻、蠶絲和玉器：中華文明起源的若干問題〉（《考古》一九九三年第六期頁五四三～五五三）。

【註七二】：同【註九】頁四三四～四三六。

據戴應新先生的報導，被剖切後的玉刀或牙璋，其厚度通常在○·二~○·三分間，甚至有薄至○·一公分者；【註七四】這樣薄的多孔石、玉刀或牙璋，尤其是其刃部的地方，一經光線的投射，則一種薄透犀利的感覺油然而生。但是試想，將一件四、五十公分的大型玉器，作如此高難度的切割，如非背後有一種精神性的狂熱在推動，是很難促成的。因此，我們仍然相信，此類被剖切成薄片之器，可能是為一種特殊儀式上的需要，或基於當時人極端的審美觀；因此，在前述羅森女史的三個看法中，我們當然不排除經濟上、技術上的考量，但最重要的還是一種宗教的狂熱，誠如杜在忠先生所提出的，與蛋壳黑陶的發展一般，是一種禮神觀與審美觀結合的表現。【註七五】

今我們由切割的痕跡來分析，希望尋得切割此類器的可能工具，再嘗試由這些工具去推測其切割的時間和文化。在留下來的剖薄的器面上，可以看到直而硬的切痕，此一切痕本身暗示著切割的工具是一種較硬之物；而且所切的對象本身已經甚薄，一般大型石刀的厚度在○·四~○·五公分，剖切成兩片，每一薄片的厚度仍維持在○·二~○·一五公分間，其切蝕掉的部分僅能在○·一公分左右，這樣少的磨蝕空間，若非工具銳利而薄是很難達成的。

這樣的推測，令人不禁想到齊家文化已經可以鑄作甚薄的銅鏡，【註七六】二里頭文化三期可以鑄作出厚度○·一公分

【註七三】：同【註一〇】頁二〇。

【註七四】：同【註五三】。

【註七五】：龍山文化先民將「薄」與「透」視為審美的標準，且將此種審美觀與禮神觀結合，於是更助長了此一風氣的盛行，因此有蛋壳黑陶的製作，薄片石、玉刀應也是此一風氣下的產物，而據劉敦愿先生的報告，山東日照陸續出現一些薄片大玉版，有刃，但大多殘斷不整；筆者推測此一類殘器，可能是在切薄時弄破的，也算是此一風氣下的犧牲品（劉敦愿《日照兩城鎮龍山文化遺址調查》《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第一期頁二八~三〇；杜在忠《試論龍山文化的蛋壳陶》《山東龍山文化研究文集》濟南：齊魯書社，一九九二）。另外泗水尹家城龍山文化墓葬出土一件玉刀，單孔，長一六·一、寬七·八~八·一、厚〇·〇六~〇·一五公分，甚薄，亦為一被切薄之器罷（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研室《泗水尹家城》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頁七九）。

【註七六】：李虎侯先生提及青海貴南朵馬臺二五號墓出土之銅鏡，厚〇·三公分（李虎侯《齊家文化銅鏡的非破壞鑑定——快中子放射化分析法》《考古》一九八〇年第四期頁三六五），但《青海文物》一書中記載的是〇·四公分，總之是甚薄之物（青海省文物處、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圖版四七）。

薄的銅爵；【註七七】這些的訊息提供了一些尋找西北地區可能存在切割此類大型玉、石器的工具之線索，似乎青銅切割工具的可能性極強；若然，則剖切的時間，也可能在齊家文化中晚期之後，或是二里頭文化期或其後；然山東的情況，似乎又不屬於此一範圍，應為龍山文化晚期之作，其切割的工具為何，就難猜測了。致於其切薄的用意為何？筆者曾有二篇文章論述，【註七八】此處僅將其重要結論摘記下來，即或為成組、成套禮器之用，或為龍山文化晚期以來，一種薄的精緻觀與禮神觀結合的具體表現。

6. 小 結

西北地區的多孔玉刀有其特殊的風格，而本文將之分作四型，加上一個剖切類型，這其間並沒有時間上先後的絕對關係；但整體看來，仍然以石峁為較早，延安次之，上孫家寨是典型而較落實時期的作品，唯每一類型因是分散地出土於距離相當遠的遺址上，因此時間上很難作直線性的排列；而多孔玉刀自成器之後，即被附加上不同時期、不同文化之痕跡，例如加刨窪、加牙、加花紋、剖切等等，一再地顯示其歷來不斷地被重視著。

四、黃河下游區的多孔玉刀

山東龍山文化出土過幾件大型玉兵，大多殘斷不全，多年來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對象，而學者的關心，不僅在其所出之物的材質、形制以及製作、切割風格，更拭目以待的是，有完全科學性的發掘；截至目前為止，山東地區出土之大型玉兵，皆為採集品或徵集品，此一情況下，令人難以對黃河下游區出土之多孔玉刀有較多的了解。

山東日照兩城鎮出土一件四孔玉刀，（圖八一）出土時已殘斷，長四八公分，此器沿著背緣有三個背孔，鑽孔的位置極近背緣，另有一小孔，甚小，鑽於一端中軸偏下方，也就是說，此孔與黃河中、上游區多孔玉刀上所謂的「端孔」，在位置

【註七七】：偃師縣文化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器和玉器》《考古》一九七八年第四期頁二七〇。

【註七八】：Yang Mei-li. "Segmented circular jades and jade cutting techniques of Northwest China,"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 29, no. 5, 6, pp. 1-21.

或性格上，似乎是不同的。其較接近裝飾孔的性質。若依復原圖觀之，【註七九】此四孔玉刀，背斜直，兩端不對稱，窄端平齊，寬端上下角渾圓，而所謂的刃側也不特意磨出刃面。

山東地區自大汶口文化以來即是一個發展斧形玉兵的大本營，由大汶口文化早期，斧形玉兵即為隨葬的重要禮器，而隨之發展出一套隨葬斧形玉兵的體制，此筆者在斧形玉兵的專文中已有詳細的論述；【註八〇】而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幾件大型陶缸肩部所刻劃的，亦為帶柄斧形玉兵和帶柄鏃形器，不見有刀的出現。因此，似乎黃河下游區至龍山文化之前長方形石刀也不是其主要的生計工具，降及岳石文化，則有大量的半月型石刀製作。

那麼在龍山文化時期出現的多孔長刀又意味著什麼？此一地區尚出土一些大型玉兵，（不止是多孔玉刀，尚有幾件玉版，由於均已殘斷，有些也不知其實際是那一類器）大多切割成薄片狀，因此，極容易就斷傷；據劉敦愿先生報導，山東日照兩城鎮發掘和陸續徵集來的，有不少是大而薄的玉版，且幾乎每一件均殘斷。【註八一】

山東泗水尹家城龍山文化墓葬遺址出土一件玉刀，（圖八二）此刀青綠色玉質，長一六·一、寬七·八、八·一、厚〇·〇六、〇·一五公分，器體扁薄，平背略傷，一端較平而不齊，有一端孔單面鑽成，另一端下角渾圓，與背相對側為刃側，刃薄如紙，為雙面刃，全器磨製精細。

此刀出土時位於墓主腿骨下方，同時出土的皆為一些陶器，散置人骨腳端和棺外，沒有其他玉器同出；【註八二】若由其出土位置最貼近墓主，以及器物本身之精緻性觀之，此一玉刀仍屬玉兵性質之器，其仍是大汶口文化以來，以斧形玉兵隨葬的習俗之延續。

【註七九】：此一玉刀之復原圖有二，一為劉敦愿先生所繪（記兩城鎮遺址發現的兩件石器）《考古》一九七二年第四期頁五六—五七）；一為林巳奈夫先生所繪（【註九】頁四四五），兩者稍不一樣。

【註八〇】：楊美莉〈斧形玉兵形制的演變〉《故宮學術季刊》第一四卷第一期（一九九六）頁一七—一五七。

【註八一】：劉敦愿〈日照兩城鎮龍山文化遺址調查〉《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第一期頁二八—三〇。

【註八二】：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研室〈泗水尹家城〉（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頁七九。

而似乎，泗水所出的此一玉刀，作為刀形器之例子，其基本形制與黃河中、上游所出者，仍有相當的差異性；其無背孔，僅一端孔，無刃線，僅在通常刀刃的一側切薄了，這些特徵均是游離於斧形器與刀形器之間者；因此，其究竟稱「刀」或稱「斧」，實也是見人見智了。依筆者之見，此一玉刀之重要性並不在其是龍山文化之刀，而是在其又為山東龍山文化時期出現薄片長方板狀器添加了一個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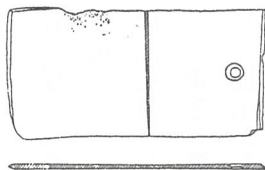
筆者曾經在一篇談論二里頭文化的玉器風格的文章中，【註八三】提到杜在忠先生曾就山東龍山文化出土之蛋殼黑陶的薄，提出山東龍山文化中、晚期的先民曾經將一種薄透的審美觀與禮神觀結合了，因此製作精緻薄透的蛋殼黑陶是作為禮神之器；【註八四】然杜先生並沒有注意到此一文化的玉禮器，亦作同一觀念的表現。今我們回過頭來再檢視泗水尹家城，或日照兩城鎮等龍山文化遺址所出之玉版，其大多是有意识地經過一次再一次的切薄的，乃至造成幾乎每一片均殘斷的現象，當然這種斷傷或許不是當時斷傷的，而是後來入土之後的傷害；而泗水所出的此一玉刀，推測其原器並非是刀形器，而是此一地區前代製作較多的斧形玉兵之遺留物，也就是說，它極有可能是山東大汶口文化時期的斧形玉兵，留至後來的龍山文化期，被拿來切薄，作為當時流行的薄透玉兵使用，因此其刃部並不是有意作刀而磨飾出來的，而是由於自背側往下切，切斜了，而造成的薄刃。

黃河下游區截至目前為止，出土有近似西北之多孔玉刀風格者，唯有一九八九年在山東臨朐朱封，一個龍山文化墓葬遺址所出的一件四孔玉刀；此刀墨綠色玉質，長方形，有三個背孔，一個端孔，長二一·七、二三·七、寬一〇·六、厚〇·七、〇·八公分；出土時置於腿骨一側，與兩件玉鉞同置一處；（兩鉞分置兩腿骨）【註八五】（圖八三）若依此墓同出之玉、陶、骨器觀之，墓主應是一個有相當經濟力或社會地位的人；此件玉刀由於出土報告上無圖片可供參考，因此，實際的情況不甚清楚，其是否為來自於晉、豫之地的外來物，或為本地的製作？也不甚清楚；然依其出土時，與玉鉞雜處而置於墓

【註八三】：同【註一一】。

【註八四】：杜在忠《試論龍山文化的蛋殼陶》（《山東龍山文化研究文集》（濟南：齊魯書社，一九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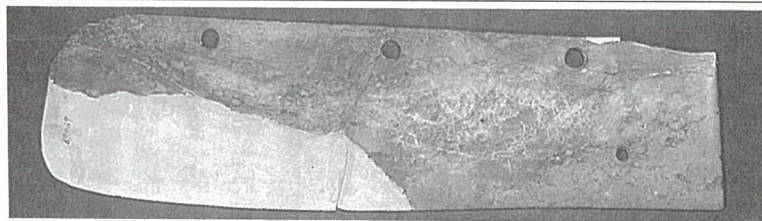
【註八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墓葬》（《考古》一九九〇年第七期頁五八七、五九四）。



圖八二 玉刀 龍山文化 長 16.1 公分 山東泗水尹家城出土 (摘自《泗水尹家城》頁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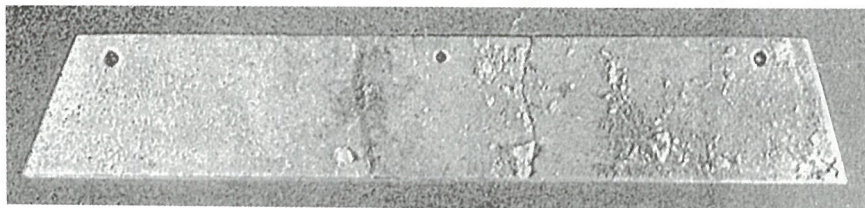
圖八〇 倒梯形冠狀器 良渚文化 (摘自《文物》19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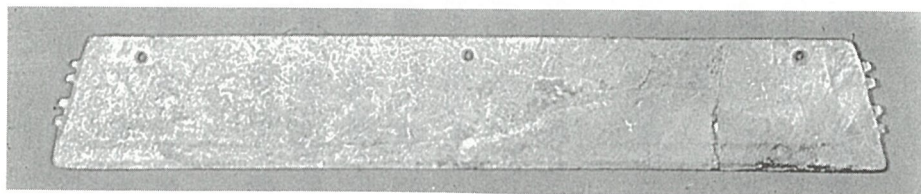
圖八一 四孔玉刀 龍山文化 長 48 公分 山東日照兩城鎮出土 (摘自《中國美術全集 玉器編》圖版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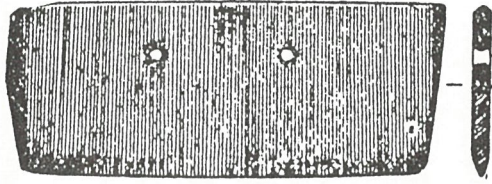
圖八四 七孔玉刀 二里頭文化三期 長 64 公分 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摘自《中國玉器全集 商、西周》圖版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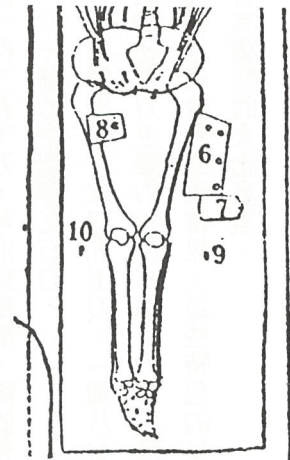
圖八五 三孔玉刀 二里頭文化三期 長 52.3 公分 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7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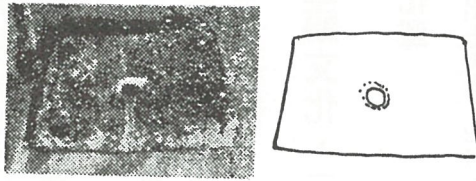
圖八七 四孔玉刀 二里頭文化四期 長 53.5 公分 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摘自《中國王朝の誕生》圖版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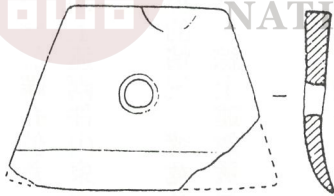
圖八八 倒梯形石刀 半山類型文化 (摘自《青海柳灣》頁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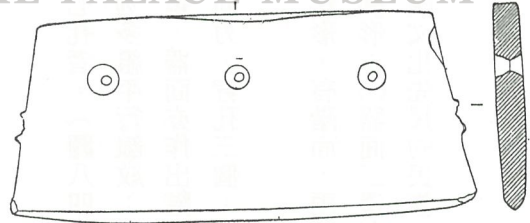
圖八三 四孔玉刀出土情況 龍山文化 山東臨朐朱封 202 號墓 (摘自《考古》1990/7)



圖八九 梯形石刀 光社文化 山西太原光社遺址出土 (摘自《文物》19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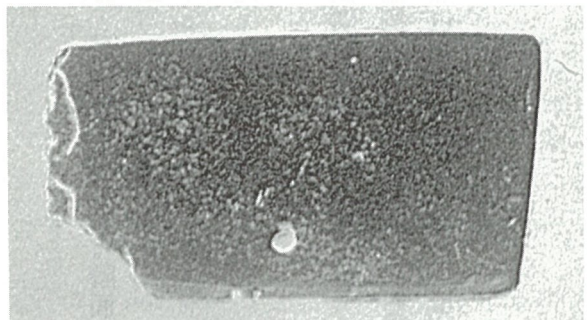
圖九〇 梯形石刀 光社文化 內蒙古中南部黃河沿岸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65/10)



圖八六 三孔玉刀 二里頭文化 長 25.9 公分 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85/12)



圖九二 刻飾方齒的陶片 二里頭文化 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65/5)



圖九一 梯形石刀 客省莊二期 陝西趙家來遺址出土 (摘自《武功發掘報告-澗西莊與趙家來遺址》圖版 68-2)

主的腿側觀之，其放置的情況與泗水尹家城的玉刀相同，（參見圖八二）而此四孔玉刀的端孔，依其不甚準確的線圖觀之，似乎其端孔的位置與日照所出之四孔玉刀（參見圖八一）的端孔位置一致，皆不在橫中軸線上，而是稍偏刃側；然此一四孔玉刀之全體造型，接近長梯形，刃側兩端尖銳，又不類上述兩件山東地區所出之玉刀；因此，還待有更詳細的資料發表，方得進一步的討論。

此一多孔玉刀的出土，令人想起山東地區出土牙璋的情況，究竟其爲此一地區本土之物？或外來之物？由於出土的情況往往不太科學，或出土的量仍屬零星的少數，實難定奪。綜上述對黃河下游區出土之刀形玉兵所作的討論，推測此一地區基本上是與製作多孔刀形玉兵的。

五、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期的多孔石、玉刀

1. 二里頭文化型

二里頭文化三期遺址出土的多孔石、玉刀中，一件七孔者，（圖八四）長六四公分，長條梯形，三側有階面，背孔七個而等距鑽出，兩側飾以整齊的牙飾各六個，器面左右陰刻多組平行線紋；另一件三孔玉刀，（圖八五）長五二·三公分，幾何學長梯形，背孔三個等距鑽出，然兩孔之間均相距甚遠，器面亦作出階面來。一九八二年夏秋，又在二里頭村的墓葬發掘出一件三孔玉刀，基形爲梯形，兩側有簡單的牙飾，雙面刃，背孔三個，刃長二五·九、寬一一·五、厚一·六公分，（圖八六）屬於中型穿孔石刀。

四期出有一件四孔玉刀，（圖八七）基形亦爲長條梯形，有階面，兩側飾以較爲板硬的牙飾；綜上述之例，二里頭文化之多孔玉刀主要的特色有四：（一）基形爲幾近幾何學的長梯形；（二）器面三邊有階面；（三）兩側裝飾以較爲呆板、整齊的牙；（四）背孔仍以奇數孔最爲常見。這些特色的呈現，自是與二里頭文化先民的民族性格有關，然也透露了多孔玉刀在二里頭文化中，有其獨特的文化意義。

基形爲長梯形，除了圖八六的梯形作寬短形的梯形之外，大多數的二里頭多孔石、玉刀，是長梯形器；梯形的出現最能與使用石、玉刀的民族有關；仰韶文化期已有一些近似梯形的石刀，例如甘青地區的半山類型文化，已出現製作規整的倒梯形石刀，（圖八八）山西太原光社文化有正梯形石刀出土，（圖八九）內蒙古中南部也有類似光社所出之正梯形石刀出土；（圖九〇）再晚的陝西趙家來龍山文化、客省莊Ⅱ期文化遺址，均有製作規整的倒梯形、正梯形石刀出土。（圖九一）因此在二里頭文化發展的可能範圍內之先行文化中，梯形的認知已是長久以來的事了。

二里頭文化的先民將梯形做一種近似幾何圖案處理，更彰顯了梯形在表現刀形器的特質上有獨到之處。然若由人體力學的角度來看，此種外形板硬多尖角的長梯形玉刀，是極不適合人體操持運作的，因此推測二里頭文化之多孔玉刀的發展，似乎逐漸走向脫離與人直接結合的特質，而純是作爲祭典上的禮器。

今再探討梯形多孔玉刀是如何使用在一個儀式上的問題？究竟是刃口朝上或朝下？由圖八四的七孔玉刀分析；此件器除刀背外，三側作出階面，即刃面與本體面由一明確的台階隔開，兩側刻飾整齊的梯形牙，器面兩側有陰刻多組平行線紋，背孔七個，長度六四公分，這樣一件製作工序如此複雜的玉刀，自然是爲其展示的需要，爲了讓這些器面上的設計一一呈現出來，其擺置的方式勢必要採取刃口朝上，刀背緊貼臺面固定豎起來的方式，而要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似乎背孔的功能，是爲實際固定之用；由於此一功能的關係，於是二里頭文化的多孔玉刀，漸以三孔爲固定點，即背孔三個，三孔緊挨著背緣，孔甚小，便於穩固。

兩側飾以梯形牙，也是二里頭文化玉刀的特色之一，這種梯形牙作爲邊緣的裝飾，不只使用在多孔玉刀上，一些陶製品也可以發現這種梯形或方形刻飾的牙之存在；例如一九六五年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一件陶片上，在刻了圖案的外框，即以梯形和方形作爲裝飾圖案。（圖九二）

陶器上以鋸齒紋或方齒刻紋、半浮雕方齒紋作爲裝飾的，以甘青地區的半山類型文化最稱盛行；甘肅蘭州花寨子半山類型墓葬，出土的彩陶在罐的口緣刻飾以鋸齒，（圖九三）並在腹面上浮雕以方齒連續花紋；而半山遺址出土的石刀，也是最早在兩側刻飾齒牙的；花寨子遺址出土一件石刀，爲黑色板岩，質地堅硬細膩，長方形，近背中央對鑽兩個並排的孔，刃爲

略帶凹弧刃，（據報告者說是因長期使用造成的磨蝕，【註八六】）兩側邊幾近對稱，一側緣飾以齒牙；（圖九四）甘肅永昌鴛鴦池半山—馬廠遺址所出之石刀，兩側緣仍然有齒狀的裝飾。（圖九五）因此，在刀形器兩側飾牙，似乎也並非自二里頭文化期起，西北地區在半山期即已有之。

而我們在前面討論延安出土之七孔玉刀的兩側牙飾時，認為此一類型多孔玉刀上的牙，乃是因應其器面上之花紋而起的，與花紋為一體的表现，和二里頭三、四期之多孔玉刀側緣上的牙組性質不同。二里頭遺址出土之玉兵，包括多孔玉刀、牙璋、玉戚、璧形鉞等，其左右側均飾以一種類似銅器上的扉稜的牙組，此一牙飾也非全然屬於裝飾性，推測是象徵玉兵所秉賦的一種神性之表現。

致於二里頭文化之多孔玉刀，刀面三邊的階面，推測是爲了讓刃面與刃線更形明確而發展出來的，這種凡事求明確的犀利性格也是二里頭先民的民族性使然。【註八七】一九七二年出土的一件方形玉版，長一二·六、寬一〇·一公分，灰色玉夾白斑，也是沿著器緣三邊作出階面，推測此一不完整器應也是屬多孔石刀類之物。（圖九六）

玉刀器面兩側所陰刻的多組平行線紋，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認為是測量時所作的記號，後來演變成一種極有條理的裝飾花紋。【註八八】總之，二里頭文化遺址所出之多孔玉刀，以長條梯形爲基形，背孔三個極靠近背緣，講究絕對的對稱與平衡；當舉行儀式時，刃口朝上，刀背固定在臺面上的。同時也反映二里頭文化的多孔石刀純屬一種禮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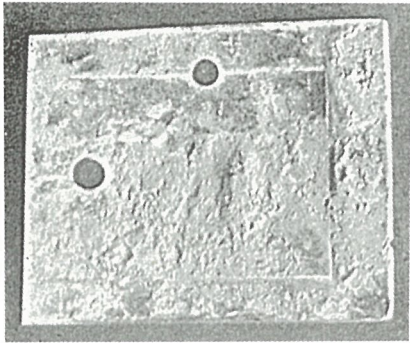
2. 二里崗期型

實際上，由二里崗遺址出土的多孔石、玉刀的例子並未有之，一般訂爲二里崗的多孔玉刀，大多是由器本身所呈現的特色，推測是二里頭風格之延續，又不及商晚期者，即將之視爲二里崗期之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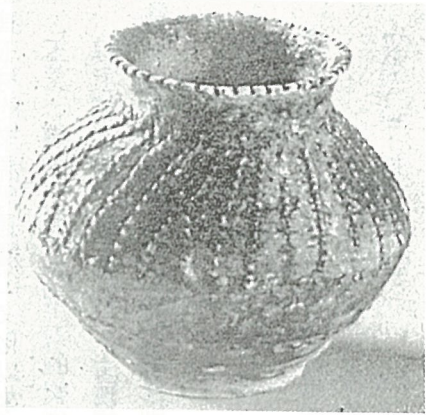
【註八六】：甘肅省博物館、蘭州市文化館等〈蘭州花寨子「半山類型」墓葬〉（《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第二期頁二三三—二三四、圖版七、八）。

【註八七】：同【註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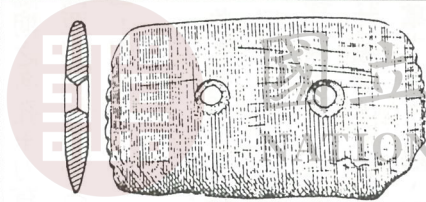
【註八八】：同【註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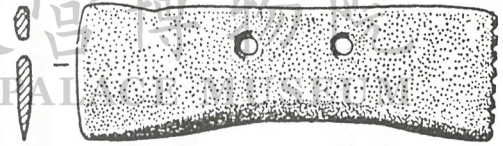
圖九六 方形玉版 二里頭文化 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197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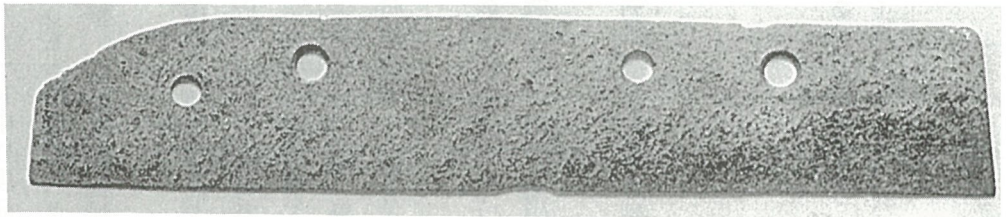
圖九三 以方鋸齒裝飾的陶器 半山類型文化 甘肅蘭州花寨子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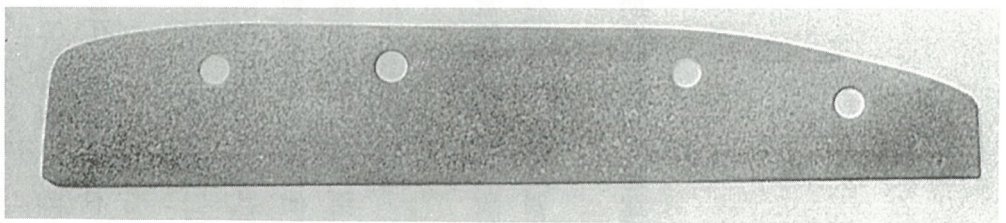
圖九五 石刀 馬廠類型文化 甘肅永昌鴛鴦池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82/2)



圖九四 雙孔石刀 半山類型文化 甘肅蘭州花寨子遺址出土 (摘自《考古學報》1980/2)



圖九七 四孔玉刀 二里崗期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Buffalo, New York (摘自《中國古玉の研究》頁 469)



圖九八 四孔玉刀 二里崗期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摘自《中國古玉の研究》頁 469)

林已奈夫先生在其專著中，訂爲二里崗期之多孔玉刀有多件，【註八九】其中以現藏於美國水牛城博物館 (Buffalo Museum) 的一件四孔玉刀、(圖九七)舊金山亞洲藝術中心 (Asian Art of San Francisco) 的四孔玉刀等爲典型，(圖九八)這些二里崗期之多孔玉刀存在一些共同的特色，如刃線平直，背脊不甚規整，一端常見斜弧圓肩，背孔、端孔意義不清楚，孔似極粗率地鑽在不同的位置上，孔甚大。

然今日若仔細檢視二里崗遺址出土的一些大型石、玉兵，尤其是被視爲重要玉兵的戈形器之製作，將會發現二里崗的先民仍以極細心的態度，製作這一些器類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崗下層出土遺物甚少，對該期玉器的製作甚爲不詳；然二里崗上層遺址，例如鄭州北二七路、銘功路等墓葬遺址所出之玉兵，大致可區分爲二類；一類是專作爲犧牲使用的，此類器常以石質或玉質較劣者爲之，入土前將其毀斷，置於腰坑內，與殉犬或人牲一起，是一種犧牲性質之玉兵；另一類製作較精緻，常以玉質較佳者爲之，出土時置於墓主貼身之處，有斷傷者也有完整者；【註九〇】有關石、玉戈的討論，請參見筆者另一篇專文。【註九一】

今就一般視爲「二里崗期」的多孔玉刀觀之，其材質尙佳，與西北地區自龍山文化以來，大量使用的玉材大致相似，推測其玉材的來源仍是龍山文化以來的傳統礦源。再者，基本上，二里崗已是一個不使用多孔玉刀的文化，其主要的玉兵是石、玉戈，幾乎不見多孔玉刀的製作。

綜上述之論，筆者之見，上述提及的此一宗製作不甚規整的多孔玉刀，推測也未必是二里崗期之製作，大抵還是改建來之物，致於如何改製？何時改製？則將是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註八九】：全【註九】頁四六九。

【註九〇】：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北二七路新發現三座商墓》《文物》一九八三年第三期頁六七~七四。

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市銘功路西側的兩座商代墓》《考古》一九六五年第十期頁五〇〇~五〇六。

【註九一】：同【註一一】。

六、結 論

若就西北地區之多孔石、玉刀而言，其製作與使用的時間，似乎是與牙璋相終始的，而畢竟多孔玉刀與牙璋在整個黃河上、中游地區文化結構中，是處於怎麼樣的共存關係？若由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有大量之牙璋，但罕見有多孔玉刀的例子觀之，似乎兩者間也並不存在絕對的關係的。

多孔石、玉刀的製作在龍山文化以前，僅見於江淮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家崗文化，且也僅出現一些極少的個例，這兩個文化之多孔石刀的形制風格不盡相同，仍存在著各文化獨特的特色；然兩地區製作多孔石刀的意念，似乎均受到該地區發展紛繁隆盛的斧形玉兵的刺激與影響而產生的；因此，若考古工作者能對此一地區文化作深入了解的話，似乎對北陰陽營所出之「七孔石刀」的命名，將會同意筆者將其視為「七孔石鉞」的看法。

降及龍山文化期，黃河中、上游成為多孔玉刀製作的大本營，若由目前的考古發掘材料來分析，石峁遺址所出之多孔玉刀的製作，似乎受到同時並存的牙璋製作的影響，尤其是愈早期的作品愈是清楚。而這種玉兵之間相互參考與影響的現象，在玉兵製作鼎盛的地區與時期，推測是普遍的現象，甚至在形制的設計上均留有一些影子；必竟玉兵已脫離了其母型的原始功能的限制，而製作者在成器的過程中，將當時流行的禮神觀和審美觀結合溶入其作品中，因此，研究玉兵者，當注意此類器中所涵容的各種因素。

黃河中、上游地區，傳統上是一個生計工具發達的地區，單、雙孔石刀自仰韶文化期起，即成為重要的生計工具；多孔玉刀的發展即在此一基礎上展開的，然在成就大型化、禮器化的過程中，受到牙璋製作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延安型的多孔玉刀，以陝西延安所採集的一件七孔玉刀為代表，從形制的發展看來，延安期的多孔玉刀，已逐漸建立起多孔玉刀的獨特造型；端孔小背孔大，全體呈現較為柔和的彎弧刀線；青海上孫家寨的四孔玉刀，則表現落實與成熟的多孔玉刀之風貌，而也較純樸地保存多孔玉刀的本色；此乃因青海齊家文化遺址，地處偏西，比較少受到其它地區同期或其後發展起來的文化的

影響之故。

在整個黃河中、上游出土多孔玉刀的遺址中，以陝西延安最接近後來成爲整個兩河流域（黃河、長江）主流文化的中原文化的地區，因此之故，在傳世的多孔玉刀中，被後代或同時期先民附加上最多痕跡的，就屬延安型之多孔玉刀爲多了，例如在有端孔的一端加刨窪的多孔玉刀，其基型則大多屬於延安型者。

二里頭多孔玉刀的製作將西北地區多孔石、玉刀的發展，推向更形式化的階段，二里頭三期的多孔玉刀，普遍顯露一種整齊的幾何性，然也極易流於呆板的末流，二里頭四期所出之多孔玉刀已完全暴露板硬的末期之象。而二里頭文化的多孔玉刀是一種禮器，由其過分強調整齊劃一，給人一種嚴肅不可親近的感覺；現存屬二里崗型之多孔玉刀，都爲傳世器，一般訂爲二里崗期之多孔玉刀，其所用玉材與製作上的一些跡象似乎不太類似二里崗上層遺址所出之石、玉戈等，推測此一宗在時代上尚難定位的多孔玉刀，也未必是二里崗期之製作。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 Study on Jade and Stone Knives with Multiple Holes

Yang, Mei-l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Among the jades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and those archaeologically excavated, the ones to which the most “mark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have been added are jade knives with multiple holes, associated with northwest China of the Neolithic age. These jades often include drilled holes, serrated edges, floral patterns, thin blades, and notched ends. Many of these so-called “mark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however, were done after the jades were carved,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modern scholars to assess their intention and meaning. Thus, the present article seeks to organize and analyz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long with objects from collections to discuss their style and meaning.

Stone and jade knives with multiple holes, judging from contemporary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re not very evenly distributed. Although these knives appear at many sites, they were not produced as everyday tools. In the Kiangsu and Anhwei region, two seven-hole stone knives were excavated from a Pei-yin-yang-ying Culture site at Nanking, while more than thirty were found at a Hsüeh-chia-kang Culture site at Ch'ien-shan, Anhwei. These knives, all exquisitely carved, include only odd numbers of holes, from one to thirteen. In addition, many jade knives with multiple holes have been excavated from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is type of knife with multiple holes made from stone or jade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an object of daily use, but rather a ceremonial- or ritual-type weapon. The meaning of the odd number of holes on stone knives from the Kiangsu and Anhwei region seems to reflect the long tradition of astronomical and calendrical study there. Jade knives with multiple holes from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meanwhile,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ya-chang* scepters and suggests that the techniques used to produce

them were similar. The rich variety of “mark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on these objects thus represents the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periods concerned.

Key words: knives with multiple holes 多孔刀
“mark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文化記號
Neolithic age 新石器時代
ya-chang 牙璋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The author's abstract wa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s 一七 through 七四.